

全球對話

14.3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三期, 以多種語言刊出

與 Geoffrey Pleyers 談社會學

Breno Bringel

日本社會學會 成立 100 周年

Yoshimichi Sato
Chikako Mori
Masako Ishii-Kuntz
Naoki Sudo

邁向 新國際主義的 政治宣言

ADELANTE – Dialogue of Global
Processes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
Ecosocial and Intercultural
Pact of the South
Nigeria Socio-Ecological
Alternatives Convergence
ReCommons Europe

理論觀點

Lidia Becker
Christine Hatzky

開放行動

John Feffer
Hamza Hamouchène
Marta Romero-Delgado
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Gomer Betancor Nuez

議題開講

> 重建依附理論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4卷 / 第3期 / 2024.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



> 編輯的話

本期刊物由一場對 Geoffrey Pleyers 的專訪打頭陣。他是ISA的現任會長，當選於墨爾本的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在這次的社會學對話中，Pleyers 和我們談到了他對社會運動研究的貢獻、對全球社會學的看法，以及他如何理解當代世界與社會學在這之中扮演的角色。

本期的第一個專題，以日本社會學會成立 100 周年為主軸。其中，會長 Yoshimichi Sato 和董事會的幾位成員，分別追溯了日本社會學學會制度化的不同階段；日本與全球之間的連結、日本社會學的最新趨勢、國際化等主題，都是本專題中特別重要的主題。

第二個主題，則是當代的政治宣言。宣言是一種集體工具，經常用於為特定思想或計劃公開地進行定位。一份宣言經常涵括了對歷史與關鍵時刻的診斷、對社會政治現實的詮釋，以及對替代方案的尋求——我們可以說，宣言也是某種度量當下的探測器。如今，文明陷於深沈的病症、替代方案面臨危機；有鑑於此，本專題彙集了五份國際主義政治宣言，它們各自針對社會與政治變革，提供了一些建議與視野。其中，有全球性的宣言，也有地域性的，比如以非洲、拉丁美洲或歐洲為主要對象；這些宣言皆針對群眾動員程序的重構，提出了可能的路徑，並討論了相關的短期、中期議程。

由 Lidia Becker 與 Christine Hatzky 撰寫的理論專題，則以深具挑釁意味的命題出發：近數十年來，社會理論的不同分支（例如後殖民研究與性別研究），花了不少時間關注差異，卻未曾著眼於相似性（similarity）。在文章中，作者嘗試提出了一個考量互連性（interconnectivity）、聚合性（convergences）、類比性（analogies）與同時性（simultaneities）的研究議程，期望能發展出以關係性為基礎的相似性的理論概

念。這樣的嘗試，也呼應了近日關於多元性與新本體論的論辯。

開放運動專題，探討了兩個受到許多關注的議題：一是近期針對兩個獨裁政府（孟加拉與委內瑞拉）的抗議，以及這些活動的後續影響；二是巴勒斯坦持續的種族滅絕，與全球氣候正義之間的關係。此外，本專題中的文章，也梳理了西班牙過去二十年間的社會運動轉型。最後的議題開講，則強調了細緻地重構依賴理論、回顧其根源並重新檢視相關著作的重要性。

希望您喜歡今年的三期雜誌。2025 年，《全球對話》將迎來創刊的十五周年。我們將能夠藉著這個獨一無二的時機，評估公共社會學與全球社會學的現況，並連結世界不同地區的倡議。■

Breno Bringel，《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發佈於[官方網站](#)。

> 投稿請寄信至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編輯：Christopher Evans.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區域編輯團隊

阿拉伯世界：(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Safouane Trabels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Bijoy Krishna Banik, Shaikh Mohammad Kais, Abdur Rashid, Mohammed Jahirul Islam, Rasel Hussain, Md. Shahidul Islam,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Yasmin Sultana, Ruma Parvin, Rashed Hossai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rifur Rahaman,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國/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Ali Ragheb.

波蘭：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Sebastian Sosnowski.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Bianca-Elena Mihăilă.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台灣：李宛儒, 周芸瑄, 郭智豪, 簡芊楹, 黃翊碩, 賴奕璋, 林韻柔, 呂道詠, 李妮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社會學對話」的部分，Breno Bringel 與 Geoffrey Pleyers 討論了全球社會學、當代世界和社會學所扮演的角色。



在主題專欄「日本社會學會成立100周年」中，慶祝日本社會學制度化一百周年。（來源：Guillermo Gavilla, 在Pixabay。）



在主題專欄「邁向新國際主義的政治宣言」中彙集了五份宣言，旨在為社會和政治變革提供建議和視野。

封面來源：Pixabay.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目錄

編輯的話 2

> 社會學對話

多重危機下的全球社會學：
專訪 ISA 會長 Geoffrey Pleyers
Breno Bringel，巴西／西班牙 5

> 日本社會學會成立 100 周年

日本社會學與日本社會學學會：一個簡史
Yoshimichi Sato，日本 8

日本社會學及其全球連結
Chikako Mori，日本 10

日本社會學研究所面臨的全球傳播挑戰
Masako Ishii-Kuntz，日本 12

日本社會學界的最新趨勢
Naoki Sudo，日本 14

> 邁向新國際主義的政治宣言

全球危機與基進替代性方案宣言
ADELANTE – 全球對話進程 16

國際主義或滅亡
進步國際 18

波哥大宣言：地球公約
南方生態社會與跨文化公約 20

奈及利亞社會一生態替代方案宣言
奈及利亞社會一生態替代方案聯盟 25

歐洲新國際主義宣言
ReCommons Europe 30

> 理論觀點

超越差異：多元世界中的相似性
Lidia Becker 與 Christine Hatzky，德國 32

> 開放運動

委內瑞拉與孟加拉的控訴：獨裁者何時放棄？
John Feffer，美國 35

全球氣候正義與巴勒斯坦解放
Hamza Hamouchène，阿根廷／荷蘭 38

西班牙的社會運動：二十年來的轉變
Marta Romero-Delgado、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與
Gomer Betancor Nuez，西班牙 40

> 議題開講

重建依附理論
André Magnelli、Felipe Maia 與 Paulo Henrique
Martins，巴西 42

「資本主義始終是一個無償系統。
成本被系統性地外部化並轉嫁到其他地方。」

Hamza Hamouchène

> 多重危機下的全球社會學：

專訪 ISA 會長 Geoffrey Pleyers



本文受訪者為 **Geoffrey Pleyers**，目前是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的FNRS研究主任。自2006年以來，他便積極參與ISA的相關事務；他在2014年至2018年間擔任ISA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研究委員會（RC47）會長，並在2018年至2023年間擔任ISA研究副會長、2023年7月更當選ISA2023-27年度會長。訪談者為 **Breno Bringel**，目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州立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是現任《全球對話》編輯，也是Pleyers教授的合作對象之一。

出處：國際社會學協會

Breno Bringel (BB)：社會運動的相關學者，對於您在另類行動主義（alter-activism）以及全球運動等方面的貢獻，應該已經很熟悉了。在您的學術作品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是超越專業學術領域的界線，以重新思考社會運動與一般社會學之間的連結。能請您以自己的實證研究為基礎，和我們的讀者分享這個觀點嗎？

Geoffrey Pleyers (GP)：社會運動是研究社會和社會變遷的迷人課題。社會運動既是社會的產品，也是社會的生產者。其反映了價值觀和共同生活方式的變化，比如人們如何在其中使用新的通訊工具，或是個體化的過程如何作為運動的一部分。社會運動涵蓋了改變社會的意圖、針對特定社會議題的提醒，並改變我們看待社會、世界，以及共同生活的方式——不論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許多社會運動具有龐大的力量，且成功地在多個國家散播其世界觀和價值觀。至於社會變遷，則不像社會行動者——以及許多社會學家——所希望的那樣快速或線性。這是我最新著作《*Change is never linear. Social movements in polarized times*》（西班牙文，CLACSO，2024年8月）的主要論點。在這本書

中，我分析了智利2019年的社會抗爭、疫情期間的運動與團結，以及巴西的進步與保守宗教運動。我認為，要理解當代社會運動以及其扮演的角色，就得先拋下我們過去對危機與社會變遷之間，以及社會運動的行動、政治變遷與社會變遷之間那種過於簡單、線性的錯誤想像。無論是在運動一出現，便激情地宣佈社會將由源頭出現改變，還是悲觀地將運動的爆發，歸咎於少數人的集體幻想，都是過於粗暴的論述。社會變遷的形成路徑極為複雜，其涉及了成千上萬公民共享憤怒、夢想與團結的激奮，也涉及選舉如何難以反映社會運動所推動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以及人們如何在這樣的過程中歷經失望。

BB：您不只經常討論全球社會學的理论面向，也參與了全球社會學理論的建構與。我們知道您早期的研究是針對另類全球化運動，想要請問您，全球的這個視角，是如何出現於您的研究軌跡中的？

GP：我一個遠離全球城市的村莊長大，父母沒有機會讀完中學，也只有一點點旅行的經驗。不過，那個村莊

>>

位於比利時、荷蘭和德國邊境，是一個跨文化的熔爐，當地對於其他文化、語言、傳統與歷史抱持著開放的態度。

當我搬到巴黎，來到 Alain Touraine 創立、Michel Wieviorka 經營的這個中心時，我也開始了新的生活。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國際環境，有從各大洲來到這裡的研究人員，其中許多人來自拉丁美洲。我的碩士和博士論文皆致力於全球正義運動，或是說「另類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我參加了在阿雷格里港、孟買、巴馬科和奈羅比舉行的前七屆世界社會論壇。那裡聚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18萬名社運人士。自我接觸到拉丁美洲和與之相關的社會運動以來，和來自那裡的同事、朋友進行對話，便顯得格外重要。這場社會運動的組織，是水平化、民主化的，我從這樣的嘗試中學到許多。我還訪問了墨西哥，並從薩帕塔原住民運動中學到了很多東西，這些經驗至今仍然在我的工作與個人生活、以及ISA的相關事務中，成為我靈感的重要來源之一。獲得博士學位後，我在印度班加羅爾進行了一些研究，並在紐約大學進行了博士後研究。我目前也還持續在歐洲旅行、做研究，主要關注環保運動和2011年後的社會運動。

BB：「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的想像，似乎逐漸被「另一個世界的盡頭是可能的」這樣的想像所取代。一種新的反烏托邦主義——「我們別無選擇」——正於世界各地出現。我們面臨巨大的挑戰，例如文明多元危機、民主惡化、威權主義正常化、軍國主義和戰爭文化深化、氣候、環境危機等等。您會如何評價這個情況？

GP：每一代社會學家都覺得自己正活在歷史的關鍵時刻、認為當下人類面臨前所未有的、決定性的危機，我們也不例外。正如拉丁美洲學者，還有您最近編輯的書所說的那樣，我們將自身的時代，視為某種相互關聯的危機糾纏不清的局面，即「多重危機」或「文明危機」。總之，現代性經歷了一系列危機。然而，這一次，受到威脅的不僅是人類的未來，還有我們的星球。「如何在有限的地球上共同生存」，是本世紀的核心問題，而社會學必須協助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研究副會長 Allison Loconto 選擇以「理解人類世正義」作為2025年拉巴特論壇的主題，我則提出「有限星球上的全球社會學」，作為2028年韓國光州世界大會的名稱。

氣候變遷和自然的破壞，並不是這個時代才開始變快的。這些現象，根植於人們看待世界、組織生活與社會的方式，我們以前所未有的、無與倫比的速度與程度，提高了大部分人類的生活水準。然而，現代性的成功，卻對自然帶來了破壞。即便氣候問題日益加劇，我們破壞自然的速率卻仍在加快。我們跨越了一個又一個門檻、走上了不歸路，打破了自然循環的平衡、影響了未來的幾個世紀。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我們仍然生活得好像情況並非如此。我們迫切地需要做出改變，卻幾乎沒有人對此感到焦急。

事實上，在許多面向上，我們似乎還倒退走了。在兩極、分化世界觀的驅動下，威權主義、種族主義、戰爭、反動的行動者興起，因應生態的措施更受到強烈抵制。威權主義的興起，同時也對社會科學造成威脅。我

對學術自由遭受的損害深感擔憂，每一週，我們都會被通知，都會有一些社會學家因為他們的研究、對民族主義領導人的批評而受到威脅、停職或鎮壓。我們需要更好地組織起來，支持我們的同事，並要求政府保護（並在許多情況下停止攻擊）學術自由，停止迫害社會學家和科學家。

學術自由的威脅，也來自學術界的一些行動者。我們呼籲每所活躍於社會科學領域的大學、基金會和機構，停止歧視從事特定主題、特定族群的研究，不再壓迫那些反對戰爭、暴力和鎮壓的同儕。

BB：這真是一個令人悲傷的情景。

GP：是的，但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與此同時，在世界的不同地區，我們也能目睹充滿希望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創新，比如「氣候世代」運動的動員與行動、比如長時間以來慢慢覺醒的全球意識，以及人類——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與世界、與自身、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正在逐漸改變。

在數位世界、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以及極端的貧富差距之下，我們身處於一個複雜的時代、生活於一個在各種層次上更加緊密連結的世界當中。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和自然破壞對全球的影響，也使得相互依存性不斷增強。

BB：面對這些挑戰、未來可能出現的灰暗情境，以及即將發生的多重危機，您認為社會學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GP：過去幾十年世界間的變革，以及新興的批判觀點，深刻地改變了社會學。這個學科的誕生，是伴隨著工業現代性的出現。當時，人們以為自然和經濟成長是無限的，民族國家屹立不搖、西方白人被認為是世界的領導者——當然，他們確實可以說是引領著社會學的一批人，其思考世界的方式對於現今的許多概念和理論仍然有深遠的影響。

這是否意味著社會學正陷入危機？自1970年代以來，社會學的危機便不斷重演。透過閱讀和會見來自不同大陸的社會學家，我有了與此完全不同的理解：我認為，我們身處於一個社會學的非凡時代。自本世紀初以來，我們的學科經歷重大變革、變得煥然一新。這主要是因為，過去數十年間，社會學對於學科邊陲，甚至是來自學科之外的、帶有反對立場的批評，有了更加開放的態度。這為不同思想、研究、地理區域和理論的對話，開闢了更多空間，使得具有批判性，卻也富有成效的對話得以發生，也形塑了關於世界和社會學的、新的思考。由於女性主義與交織取徑、底層/後/非殖民研究以及南方觀點、知識論的貢獻，新的對話於是開啟，新的聲音也得以被聽見。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重新審視了社會學的學科歷史、準則以及一些主要偏見。

要做的還有很多。不過，我們應該先把視角放在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五年，社會學界取得的成就。我還是學生的時候，社會學的歷史，就是由一些西方學者的貢獻來總結的。如今，要談社會學的歷史，我們得專門為

W.E.B Du Bois 開一堂課，在整合性別和交織理論之後，才來討論不平等；在不提及全球南方重要貢獻的情況下講述當代理論，也是不行的。承認其他研究人員的貢獻和觀點，為重新審視我們的學科、提出不同的問題，打開了一扇大門。最重要的是，這使我們能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審視其挑戰，並能創造更公平、更永續的替代方案。正如我在上一期 [《全球對話》\(13.3\)](#) 中提到的，這進一步肯認了過去、現在的西方社會學家，所做出的那些重要貢獻：「全球社會學不該繼續以西方大學與經典的普遍性宣稱為前提，也不該只著重於批判此點。」

BB：我們現在有哪些關鍵問題需要解決？我們辦得到嗎？

GP：我認為，這包括威權主義、反動行動者的崛起，以及氣候變遷和生態崩潰。這些問題促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和社會學），並有效地為應對挑戰做出實質的貢獻。這項任務很艱鉅，但我們也有新的資源來完成它。

數位世界和人工智慧的興起，不僅帶來了新的挑戰，也讓我們有了更強的分析工具，能夠存取更大量的資訊。更為重要的資源，是我們將能夠更好地整合世界各地研究人員的知識、分析與貢獻。在許多方面，社會學比本世紀初更加開放、富有創造力和紮實。我們有更完善的能力，可以為了解世界做出貢獻，並應對當今的挑戰。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社會學家來說，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期。

BB：《全球對話》能如何協助我們克服這些障礙？

GP：透過《全球對話》這個媒介，我們能在簡短、易讀的文章中，藉由深入分析地方現實，釐清各大洲的複雜議題，而且這些內容，是研究人員、學生與公民都能夠理解的。這正是自 Michael Burawoy 創辦這份刊物以來，所提倡的全球與公共社會學的內涵之一。

每一期的《全球對話》，都顯示「全球」並非是一個與地方現實的毫無關聯的層級（這將是「方法論的全球主義」）。相反地，全球社會學是建立於世界各地社會學家的貢獻之上。■

> 日本社會學與 日本社會學會：一個簡史

Yoshimichi Sato，日本京都先端科學大學，日本社會學學會會長



第97回 日本社会学会大会
2024年11月9~10日
於 京都産業大学

 The 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出處：日本社會學學會

我將僅從我的角度對日本社會學及日本社會學學會 (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簡稱 JSS, 下同) 的歷史進行簡要的描述，這是因為要涵括這段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的所有細節畢竟已經超過了我的能力範圍。

> 旨在於改善日本社會的創辦

JSS 創立於 1924 年，但在這之前日本社會學家便已經開始了社會學的研究。正如孔德 (Auguste Comte) 在法國革命以後構想法國社會的重建那樣，日本社會學家也在明治維新以後對日本社會能夠以及應該如何被建構進行設想。他們嚴重依賴了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的思想，但正如 Akimoto 所說的那樣，他們是根據各自的政治立場以兩種不同的方式——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去加以詮釋的。

日本社會學致力於反映日本社會的社會現實 (social realities) 並尋求解決。日本社會戰前的主要社會問題是勞動問題、貧窮以及民族主義，日本社會學家仔細地研究了這些問題，希望能夠改善日本社會。儘管戰前的日本社會學嚴重地受到歐洲社會學的影響，Yasuma Takada，一位日本社會學歷史中的一位巨人，還是建

立了一種以社會連帶作為社會學基礎的原創理論。他的意圖是使社會學成為社會科學種的一個獨立領域。其理論的原創性受到了當代日本社會學家的高度重視，而他的作品也成為了戰前日本社會學的一個里程碑。

> 後二戰時期：現代化及馬克思主義理論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社會學家繼承了 Yasuma Takada、Teizo Toda、Eitaro Suzuki 等偉大的戰前社會學家的理論遺產。與此同時，根據 Tominaga 的《戰後日本社會學》(Sociology of Postwar Japan)，他們還針對諸如家庭社會學、鄉村社會學、城市社會學和工業社會學等特定領域都進行了社會學的考察。這導致了日本社會學的碎片化。而面對這一境況，出現了兩大理論流派：現代化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

現代化理論受的是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及其同僚所提出的結構功能論的影響，它主要專注在現代化和工業化對社會各階層所造成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針對現代化和工業化的影響進行研究，但其分析視角與現代化理論有所不同：它主要專注於階級結構的影響。而這是源自於馬克思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矛盾的理论。

>>

現代化理論是在日本經歷經濟高度增長的時期（1955-1973）變得流行的，描繪了日本社會當時的現實情況並且樂觀地預測了它輝煌的未來。然而，這一理論因為幾個原因而喪失了聲望：它無法解釋日本在經濟泡沫破裂以後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停滯狀況；並非世界上所有國家都跟隨它預測的軌跡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吸引了許多日本社會學家。他們觀察社會種不同群體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社會問題，例如資本家／雇主與工人／雇員之間的衝突，以及在污染問題上大企業與當地居民之間的衝突。然而，這一理論同樣因為不同的原因而被削弱，比如新左派的崛起和蘇聯和東方集團（Eastern Bloc）的解體。

> 新方向、美國影響, 以及 SSM 調查

在現代化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衰弱以後，所謂的多重典範（multi-paradigm）時期開始了。這一時期出現了各個領域的出色理論：例如現象學社會學（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以及關注資訊社會、全球化以及福利國家的社會學等。

需要強調的是，戰後日本社會學受到了美國社會學的強烈影響。雖然歐洲社會學也具有影響力，美式的經驗研究——質性的與量化的——吸引了許多日本社會學家。其中一項主要的量化研究是「全國社會分層與社會流動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即俗稱的 SSM 調查。第一次 SSM 調查由 JSS 在 1955 年與 ISA 國際項目合作（ISA international project）進行。從此以後，該調查每十年都會進行一次，而下一次將會在 2025 年進行。所有 SSM 調查的數據集都可從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底下的社會科學日本數據檔案館（Social Science Japan Data Archive）獲取。

> 國內與國際之發展軌跡

JSS 是隨著日本社會學的這一演變而同步發展的。自它在 1924 年建立起就開始發行其官方期刊。此期刊換了好幾次名字；目前的名字是《日本社會學評鑑》（Japa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第一期發行於 1950。《日本社會學評鑑》的所有文章都能從[網路上](#)取得。除了發行期刊，協會自 1925 年起開始舉辦年度會議。第 97 屆年度會議會於 2024 年十一月在京都產業大學舉行，慶祝它的百週年。會議期間會由一場特別的國際座談會，ISA 主席 Geoffrey Pleyers 將作為特邀演講者。

值得一提的是，JSS 一直活躍於國際舞臺。正如稍前提到過的，第一次的 SSM 調查是與 ISA 項目於 1955 年合作進行的。JSS 於 1992 年出版了官方英文期刊的首期《日本社會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並在之後的每一年持續出版（此期刊在 2022 年更名為《日本社會學期刊》[Jap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許多日本社會學家與國際社會學家合作並活躍於 ISA；反映 JSS 國際活動的最重要事件是 2014 年在橫濱舉行的第十八屆 ISA 世界社會學大會（XVIII ISA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多虧了 ISA 以及世界各國協會的支持，該大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自那次大會依以來的十年間，JSS 在同 ISA 和各國協會的協同合作下進入了國際活動的新階段。■

來信寄至：
Yoshimichi Sato <sato.yoshimichi@kuas.ac.jp>

> 日本社會學 及其全球連結

Chikako Mori, 日本同志社大學



出處：日本社會學學會

日本社會學對全球社會學討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這使得要在一篇簡短的文章中對它們進行全面評估變得具有挑戰性。這些貢獻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不同的層面、時間和地點——舉例而言，[Chizuko Ueno在中國的作品](#)是極具影響力的——而如何評價它們目前還尚欠明確共識。事實上，評價會因評估者的觀點而大不相同。因此，本文的目的不在於對所有貢獻進行評估，而是要強調日本社會學學會（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簡稱 JSS, 下同）及其成員為全球社會學討論建立連結和提出貢獻所做的努力，從而促進了 Geoffrey Pleyers 所說的「[更新的全球對話](#)」。

> 從「西方中心主義」到「國際化」的嘗試

日本社會學的發展，正如 [Shigeto Sonoda](#)所指出，其歷史可以往回追溯到 1880 年代，從一開始就帶著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當時候大多數的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於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接受、引介以及消化。而在 1924 年建立的 JSS 中，出現了一些聲音要求與全球社會學有更多的連結。如[Seiyama](#)所指出，JSS 是最早的

八個國家社會學協會之一，並於 1950 年在國際社會學協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 ISA, 下同）發出倡議時加入該協會，當時 ISA 成立僅一年。作為 JSS 的代表，Kunio Odaka 參加了 ISA 首屆大會，而他在大會中呈現的全國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簡稱 SSM）之成果隨後於 1959 年被 Lipset 和 Bendix 所引用。

JSS 的一些成員持續地參與到 ISA 當中，包括加入了執行委員會（2010-14）的 Yoshimichi Sato。Hasegawa 向我們指出這些努力最終促成了 2014 年在橫濱成功舉辦的第十八屆國際社會學協會大會（XVIII ISA Congress），此次大會吸引了超過六千名參與者。需要留意的是，由 JSS 主要成員所追求的國際化的道路與日本政府以提升國際排名為目的的民族國家模式（nation-state model）的國際化進路是截然不同的。正如 Shujiro Yazawa 於 2011 在《[全球對話](#)》中受 Michael Burawoy 訪問時指出的，社會學真正的國際化在於在全球或地球社會（planetary society）中建立一種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全球社會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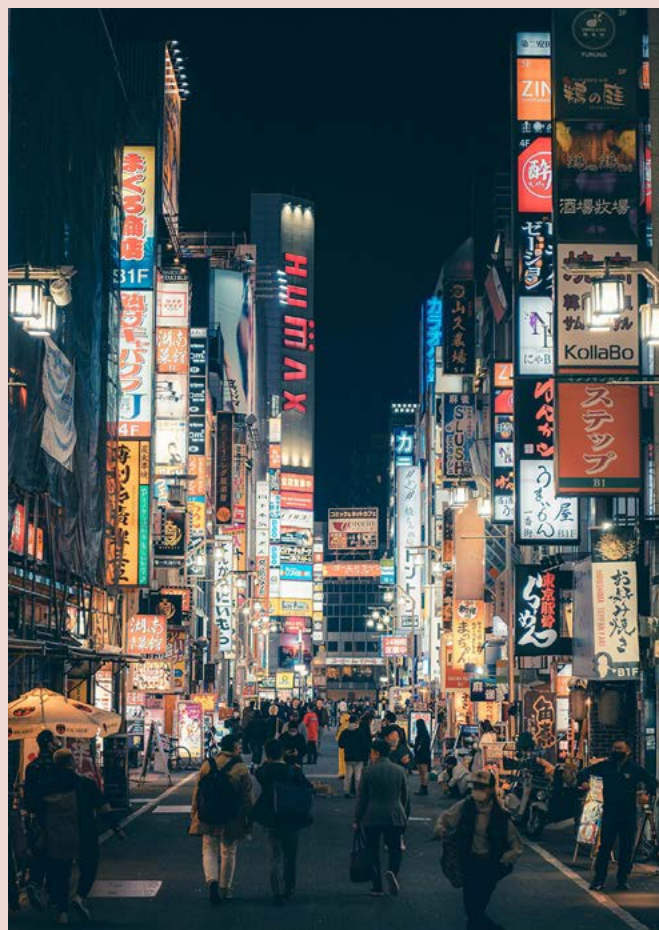
> 專注於東亞社會學

除此之外在區域性層面也有著顯著的努力。如Sonoda 所指出，自 1980 年代以來，包括中日社會學協會 (Sino-Japanese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在內的多個協會相繼成立，同時日本社會學家也日益參與更廣泛的亞洲社會學網絡，比如 1996 年成立的亞太社會學協會 (Asia 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和 2010 年成立的亞洲社會研究協會 (Asian Social Research Association)。此外，在國內大學的社會學部門裡頭進行的國際研究項目在強化與其他亞洲社會學家的協作上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值得留意的例子包括 Emiko Ochiai 和 Yoshimichi Sato 分別在京都大學以及東北大學領導的研究項目。

諸如此類的舉措的制度化也正逐漸成形中。2003 年開始的東亞社會學家會議 (East Asia Sociologist Conference) 促成了東亞社會學協會於 2017 年十月的成立——其首次會議於 2019 年三月在東京中央大學舉行。這些東亞的社會學交流促成了大量的出版，如 2014 年出版的《東亞社會學的尋求》(A Quest for East Asian Sociologies) 以及 2023 年出版的《後西方社會學便覽：從東亞到歐洲》(Handbook of Post-Western Sociology: From East Asia to Europe)。這些舉措旨在於對呼應「[一個非霸權的世界社會學](#)」(a non-hegemonic world sociology) 的全球社會學作出貢獻。

> JSS 的新舉措與諸挑戰

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連結不同的討論，JSS 已作出了多項舉措：1992年創辦《日本社會學國際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在與南韓（自2007年）、中國（自2011年）以及台灣（自2015年）的交換協議的基礎上嵌合不同的小組；還有在2023年開設官方部落格，[用英語介紹日本社會學](#)。另一項值得留意的舉措是旅行獎 (Travel Award；前身是旅行補助金 [Travel Grant]，於 2008 年創立)，用於獎勵希望在 JSS 年會上就特定主題——2022 年的主題為「COVID-19 與社會」、2023 年的主題為「危機背景下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in Context of Crises) ——發表研究的全球年輕學者。



日本東京。出處：Willian Justen de Vasconcellos, 在 Pexels。

而在 2024 年，藉著 Geoffrey Pleyers 於十一月九號至十號參加 JSS 年會的機會，旅行獎的主題設定為「[去中心化的全球社會學](#)」(decentring global sociology)。這已吸引了創紀錄數目的旅行獎參與者。儘管與東亞各國的對話已取得顯著的進展，與全球南方及其認識論——如去殖民或底層視角 (subaltern perspectives) ——的交流則相對不發達。對 JSS 及其成員而言，2024 年年會是全面參與到全球對話並且為與時俱進的全球社會學提出貢獻的一次重要機會。■

來信寄至：Chikako Mori <cmori@mail.doshisha.ac.jp>

> 日本社會學研究 所面臨的全球傳播挑戰

Masako Ishii-Kuntz，御茶水女子大學，日本。



出處：日本社會學學會

在我早期於美國的職涯中，鮮少在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年會或是其他組織舉辦的會議上碰見日本的學者或研究生。不過這樣的情形大概從這世紀初開始有所改變，我越來越常在美國的會議上見到來自日本的社會學者。

> 語言隔閡的整合與突破

2014年第十八屆國際社會學會世界社會學會議在日本橫濱舉行，至此日本的社會學家不只提高了在國際會議上發表研究成果的意願，也開始在以英文撰寫的國際期刊上出版研究論文。國際社會學協會 (ISA) 的官網提供了2010年後的會議數據，我們也可以從中看出以上的轉變。2010年，有205位來自日本的參與者出席在瑞士舉辦的世界會議，位居該會參與國的第七名。到了2014年的橫濱會議，參與人數翻倍來到了429人。在這之後，雖然日本的參與者分別在多倫多 (2018年) 及墨爾本 (2023年) 會議減少至115及277人，不過仍是兩次會議中，參與人數第五多和第四多的國家。

這不僅對日本社會學家來說是個正向的改變，對其他國家的同行來說亦是如此。回想起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當時的我正在進行博士論文研究，那時幾乎沒有以英文撰寫的日本社會學研究，因此我大多時候只能閱讀以日文撰寫的書籍和其他資料。雖然能夠以日文閱讀是件開心的事，但同時我也覺得這些研究不應該只讓懂得日文的人看見，應該要引介給其他社會學者。比起過去，现在的日本社會學家不僅更加活躍於國際會議，也會將研究投稿至英文期刊，如此一來，日本學者的研究有更大的機會可以被世界看見。

儘管日本社會學研究在近幾年有更多的曝光機會，現在仍有些問題阻礙著日本研究在全球散播。以下將根據我在大學執教的經驗和我所觀察到的問題，討論當前的困境為何。另外，我也會提供一些解決辦法上的建議，以及介紹目前日本社會學會 (Japan Sociological Society, JSS) 針對這些挑戰所採取的作為。



日本東京。出處：Oscar M.，在Pexels。

> 國際研究的三個挑戰與建議

首先，也是最主要的阻礙是，許多日本學者仍舊在與國際學者使用英文溝通時感到有些隔閡。這可能是因為日本的英文教學制度不強調對話能力的培養，Ikegashira、Matsumoto和Morita也曾指出這個問題；同時，日本社會學家又大多想將英文說得跟母語人士一樣。當他們發現發表時的語言要求其實不需要到母語人士的程度時，減輕了許多不安和緊張的情緒。JSS內部也創立了一個促進國際研究活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ctivities），除了舉辦英文摘要寫作的年度工作坊外，也提供針對如何以英文發表研究論文的講座。許多研究生在參與了這些活動後，摘要紛紛通過了國際社會學協會世界社會學大會的發表審查。

其次是，許多日本社會學的研究生和學者太過要求在發表和寫論文時達到完美。就以在會議上發表為例，我發現許多日本學者會準備講稿並彩排多次。雖然練習是重要的，但太過依賴講稿會使報告變得不夠流暢。除此之外，許多日本的講者也會因為提問環節無法準備講稿而感到非常緊張。我通常會建議日本的研究生和學者們不要害怕出錯，也可以現場告知提問者自己沒聽清楚的部分。JSS可能需要提供相關的研討會給學生和新進學者來精進他們的發表能力。

最後，除了克服語言障礙外，提供研究者參與海外會議的交通和住宿經費也是必須的。JSS提供了旅行補助給參與國際會議的會員，而日本政府、私人組織和大學端也都提供各式獎學金給參與海外會議的學生們，有些美國的學術單位亦提供旅費補助給國際參與者。我強烈建議像JSS這樣的日本學術組織可以彙整有關參與國際會議的獎助金資訊供眾人使用。

總而言之，若想將日本研究生和學術成果推廣到國際，學術機構和心理層面的支持都是必要的。並且，無論是增加日本學者在國際會議上的參與度，還是在英文期刊上的能見度，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來信寄至：
Masako Ishii-Kuntz <ishii.kuntz.masako@ocha.ac.jp>

> 日本社會學界的最新趨勢

Naoki Sudo,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日本



出處：日本社會學學會

日本社會學領域近期研究趨勢的兩個特點：首先，日本社會學家的主要研究興趣轉移至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社會學者對於方法論的興趣不僅限於量化，還包括質性的研究方法。其次，與二十世紀相比，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學家的興趣更加多樣化。因此，日本社會學家的主要興趣轉向的趨勢，可以解釋為其只是在社會學傳統領域內，增加了的新研究主題。因此，可以說日本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理論的興趣在過去數十年間有所減弱。

> 從社會學理論到社會學研究方法

為了證實日本社會學從理論到方法的研究重心轉變，我們可以參考兩位日本社會學家所寫的兩篇研究。第一篇是 Ken' ichi Tominaga 的著作《[戰後日本的社會學：一個當代史研究](#)》(2004)；另一篇則是 Hiroki Takikawa 的文章《[戰後日本社會學的主題動態理論：源自結構主題模型的日本社會學主題分析評論全集](#)》(2019)。儘管上述兩作者的著作並未分析日本社會學的最新趨勢，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們所提出的框架能繼續被應用於最新的情境。

這些作者認為，兩個對立的社會學學派思潮（結構功能論和馬克思主義）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主宰了日本社會學者的研究。然而，這兩種研究思想都受到下一代日本社會學家的徹底批判，隨後並失去了其影響力。而新的社會學理論（例如 Michel Foucault 的相關研究、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資本理論、Niklas Luhmann 的社會系統理論、Jürgen Habermas 的傳播理論、Anthony Giddens 的結構理論等等）取代了結構功能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成為學者在日本社會學領域的研究理論偏好。此外，日本社會學家對社會學理論的興趣，自世紀初以來也迅速減弱。

根據 Takikawa 的看法，日本社會學家將社會學研究方法視為以量化為主體來分析資料的研究方法，而非將社會學理論本身視為一種分析工具；許多社會學者都熱衷於使用先進的量化研究方法分析社會現象。而與此同時，其他日本社會學家則也有透過使用質性研究法來研究社會現象，例如敘事分析。正如 Takikawa 所指出的，量化與質性的研究方法在本世紀前二十年是被日本社會學家廣泛接受的。上述事實也顯示了在二十一世紀初，日本社會學界的量化與質性方法並非競爭關係，而是互補的關係。 >>

一般來說，先進量化研究方法的擴展，可視為此學門作為一門科學學科的正常化跡象。只是上述的量化研究方法，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是與質性方法有著正面的共存關係的，只是質性本就比量化更難以透過科學方法來標準化規範。而這也顯示了日本社會學者對量化方法的偏好，並未反映出他們對此領域作為一門科學學門在規範上標準化的偏好。因此，我們應該探討其他日本學者從理論轉移到其他社會學方法的原因。

> 二十一世紀日本社會學多元化的主題

Hiroki Takikawa指出，二十一世紀日本社會學者的研究主題比二十世紀後期更為多樣化。具體而言，日本社會學者除了傳統研究主題（社會階級、家庭、勞動、組織、都市研究等）之外，增加了新的研究主題（如環境問題、性／性別、自我認同等）。我們假設他們都使用了新的量化和質性研究方法來處理這些複雜且高度相互關聯的主題。此外，對於這些社會學學者而言，這些方法也可望成為他們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經濟學、政治學、法律和社會資料科學等）的學者之間的重要溝通工具。研究主題的多樣化，以及與不同學科的社會科學家合作的需求，很可能是日本社會學家開始強調與展現他們對研究方法興趣的原因。

此外，日本社會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經歷了快速的社會變遷。對於日本社會學家而言，這樣的變化使得實際且即時的解決方案變得困難。首先，日本人口在這段期間大幅度地老化，日本已成為如今全球最高齡的國家之一。這使得永續性成為日本在談論社會福利制度時最重要的問題。其次，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日本經歷了長期的經濟停滯。因此，非正式員工（兼職和臨時工）佔整體勞動力的比例上升。此外，由於因為需要解決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問題，移民人口和婦女勞動參與率也不斷增加。這些變化都擴大了社會的不平等，並帶來了傳統社會學理論無法解釋的新社會問題。

因此在二十一世紀初期，日本社會學者必須處理傳統社會學理論無法解釋的新課題，他們的研究取徑也由理論轉移到研究方法。這並不是說理論對日本社會學家不再有幫助，而是他們需要新的社會學理論來充分解釋新的社會課題，並專注於處理新出現的任務。如果沒有建立新的理論來解釋這些議題，那麼日本社會學家們將無法確定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方法究竟為何。

> 結語

日本社會學的近期趨勢似乎與全球社會學的趨勢有部分共鳴。雖然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社會在二十一世紀初人口迅速老齡化、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情況可能很顯著，但筆者認為，研究取徑從理論轉向方法、研究課題的多樣化是全球社會學領域的共同特徵。這種趨勢所導致的問題不僅存於日本社會學界，同樣也發生在全球的社會學領域。這樣的現象顯示，日本的社會學家們應該與國際的社會學者合作，共同克服他們在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問題。■

來信寄至：Naoki Sudo <naoki.sudo@r.hit-u.ac.jp>

> 全球危機與 基進替代性方案宣言

ADELANTE - 全球對話進程

| 出處：[Adelante](#)，2024。



> 我們面臨的危機

• 世界正捲入多重危機的深淵。深層的裂痕將人類分裂，也將人類與大自然的其他部分分割開來。目前佔宰制地位的壓迫性系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造成並維持這些危機。這個系統的根源在於階級、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父權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統治、種性主義的結構與關係，以及我們人類中心的視角。正是這些根源，而不僅是從危機中表現出來的症狀，也同樣需要被挑戰和改變。

• 極權、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政權的文化霸權對人民和大自然的主宰是一個歷史進程。這使得整個社會變得可有可無，並取代和摧毀了不同的認知／存在／行為／生活方式。

• 在現今軍工複合體和資本主義的支持下，宰制體系製造或助長民族國家、種族和宗教信仰之間的戰爭和衝突，無辜的人民和環境面臨最嚴重的後果。

• 生態危機，包括生物多樣性的流失、氣候變遷、地球的污染和毒化，已將地球帶到第六次大滅絕的邊緣：這是人類行為造成的第一次大滅絕，進而損害數十億人的生命和生計。

• 以無止盡的經濟成長為基礎的「發展」取向本身就是不永續的，它製造了「已開發國家」、「新興國家」和「未開發國家」等錯誤的區分，並鼓勵不健康且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

>>

• 製造多重危機的體系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大堆「解決方案」，這些方案只治標不治本，例如碳交易、綠色成長、淨零排放、地球工程及其他技術修復與市場取向。

• 這些危機的不同面相相互交織。因此，我們需要整體性、跨部門和整合性的對策，並指出真正、系統性的替代性方案。

> 人們的反應：抵抗與替代方案

• 為了因應這些危機，大量的草根行動和社會運動正在崛起。這些運動闡述並展現了轉型過程，引導我們邁向一個多元、民主、去殖民、公正、公平/平等、解放、女性主義、生態智慧、和平、後資本/後發展主義、生物文化、繁榮、共同實踐和以基進的愛為基礎的世界。每個運動對於這些價值與詞彙都可能有自己的詮釋與理解，即使我們根據共同持有的基本價值與道德信念將自身編織在一起，我們也應該尊重這些多元性與多樣性。

• 原住民、草根社區、等各種集體與個人都在實踐永續、公平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態農業、奪回公有地、社區健康、替代性學習與教育、性別與性正義、基進民主與能動性、以關懷和分享關係為優先的在地化經濟、工人擁有或控制的生產、維持或恢復與所有大自然的非二元關係，以及以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社群對大自然的保護、維持或恢復文化、語言、知識系統與存在方式的多樣性，以及其他類似的選擇。其中許多都包含在尊重生命的世界觀中，有些是祖先與原住民傳統的延續，有些則是現代工業社會的反趨勢。然而，這些倡議還太小或太零散，無法獲得更廣泛變革所需的臨界質量。

> 我們對轉型的承諾

為了邁向深度轉型，我們承諾：

- 分享和瞭解重要的改變策略，並推廣已實現的鼓舞人心的改變故事。
- 貢獻於共同奮鬥，爭取裁軍與和平，以創造公正的社會與生態轉型。
- 探索並深化我們共同的立場、倫理與價值，即使我們同樣讚許並尊重多樣性與差異。
- 負起政治決策的責任，最重要的是由下而上建立人民的力量。我們的行動是要確認，這不是宰制的力量（power over），而是正向轉變的力量（power to/with）。
- 將反抗運動和建設性的替代性方案連結起來，創造我們想要的世界。
- 推動從地方到全球的草根直接行動，超越民族國家，建立各地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凝聚與關懷。
- 將我們的尊重與關懷延伸至更廣泛的生命圈。
- 推廣在民主控制下的對民眾平等的再生科技和友善工具。
- 建立一本共通（但多元、文化多樣）的字典，並了解各種語言的詞彙。
- 探索宰制系統在多大程度上根植於我們自己習慣的組織與關係方式中，並致力於個人與集體的療愈工作，以支持我們邁向更深層連結的存在方式。

儘管有強大的人民運動在辨識與抵抗這些危機背後的力量，同時實踐與推廣公平且永續的基進替代性方案，但我們仍缺乏前後一致、整合的回應。因此，我們承諾在溝通、建立關係與合作上，讓我們的社群、組織與運動能夠集中力量，共同合作。我們秉持民主、沒有階級化的動員精神，對各種意識形態、策略、路線和觀點持開放態度，以尋求進步轉型，邁向我們想要且需要的世界。■

自2020年11月以來，[全球替代性方案織錦 \(GTA\)](https://adelante.global/) 開始在尋求系統性的、由下而上的轉變以實現正義的各種全球進程之間展開對話。除了GTA之外，還包括：[全球對話進程](#)、[全球綠色新政](#)、[超越發展全球工作小組](#)、[草根到全球](#)、[多方匯流](#)、[進步國際](#)和[邁向新世界社會論壇](#)。這個平台在2021年被命名為ADELANTE，並擁有自己的網站，提供最新資訊和資源：<https://adelante.global/>。

> 國際主義或滅亡

進步國際



出處：[進步國際](#)，2024。

在 2020年9月舉行的進步國際首屆高峰會上，理事會通過了以下宣言。

I. 國際主義或滅絕

本世紀的危機威脅著各洲各國所有生命的滅亡。國際主義不是奢侈品。它是生存的策略。

II. 進步的定義

我們的使命是建立一個進步力量的地球陣線。我們將「進步」定義為對以下世界的渴望：民主、去殖民化、公正、平等、解放、女性主義、生態、和平、後資本主義、繁榮、多元，以及被基進的愛所約束。

III. 世界各國人民，組織起來

我們是工人、農民、和全世界人民起身反抗專制寡頭的反動勢力。我們的目標是國際組織：結合跨國界的力量，以奪回屬於我們的地球。

IV. 我們建立基礎設施

我們的任務是為國際主義建立基礎設施。進步的力量仍然支離破碎，而財富和權力卻在世界各地鞏固。我們為地球陣線建立鷹架，讓它有力量戰鬥並取得勝利。

V. 團結，而非墨守成規

我們透過共同奮鬥來尋求團結。目前的危機需要所有進步力量的策略聯盟。但協商不需要屈服。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廣泛的聯盟，同時為聯盟內部的創造性論點留出空間。

VI. 透過相互力量建立夥伴關係

我們相信，沒有相互力量的夥伴關係只是宰制的另一個名稱。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的目標是重新平衡，而不是在我們的聯盟中重現權力的差距。

VII. 資本主義是病毒

我們渴望根除各地的資本主義。我們相信剝削、剝奪和環境破壞已經寫入資本主義的基因密碼。我們不支持拯救這個體系的努力，也不支持讓它擴張到地球的每個角落。

VIII. 國際主義意味著反帝國主義

我們的國際主義反對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從戰爭和制裁到私有化和「結構調整」。我們相信這些不僅是某些國家支配其他國家的工具。它們也是分化的工具，讓世界各國人民互相對立。

IX. 語言就是力量

我們使用多種語言。語言障礙強化了階級統治、白人至上和原住民被剝奪的權利。我們的目標是超越語言障礙，找到我們共同的反抗語言。

X. 前線的自由

我們的國際主義是交織的：我們相信種族資本主義在其帝國擴張過程中所積累的層層壓迫，需要我們將爭取解放的前線抗爭集中在全球經濟的基層：為了食物、為了土地、為了尊嚴、為了解放。

XI. 國際解放主義

我們反對種族主義、種性主義和所有形式的社會宰制。我們承認白人至上是世界體系的組織原則。我們反對壓迫性階級制度，這是我們國際主義的基礎。

XII. 去殖民不是隱喻

我們的目標是使地球去殖民化。我們不滿足於象徵性的去殖民行為。我們的要求是對過去的罪行作出全面賠償，並立即恢復世界上所有被剝奪人民的土地、資源和主權。

XIII. 女性主義政治、女性主義實踐

我們相信，在性別壓迫的體系中，沒有人是自由的。我們的目標是打破父權體制，同時破壞它所依賴的二元性別結構。我們的政治方向是關懷、合作和共同負責。

XIV. 布宜諾斯艾利斯

我們不以成長來衡量進步。擴張的急迫性是生態滅絕的引擎。我們追求免於飢餓和匱乏的美好生活方式，並以集體共存的品質來界定我們的成功。

XV. 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

我們的目標是持久的和平。但和平只有在社會正義的保障下才能持久。我們努力拆除戰爭機器，代之以以合作和共存為基礎的人民外交。

XVI. 革命，而非政權更迭

我們支持人民運動來改變社會和收復國家。但我們反對為了保護資本利益和協助帝國進步而推翻政權的企圖。

XVII. 贏得選舉是不夠的

我們的任務是在地球上建立人民力量。選舉是改變政治、將人民需求轉化為政府政策的機會。但我們知道，贏得選舉不足以完成我們的使命。

XVIII. 來自多元化的力量

我們的聯盟受共同的集體解放願景所約束。我們不強加這個願景，也不將一個方案強加於其他方案之上。相反，我們將我們的需求、知識和政策優先順序聯繫在一起，以建立一個共同的計劃，從多元主義中獲得力量。

XIX. 關係是基礎

我們的國際主義是親密的。新技術承諾了社區和連接，但卻播下了嫌隙與幻滅的種子。我們相信，除非我們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了解和信任，否則我們無法成功。

XX. 對話是不夠的

我們的目標是集體行動。我們不滿足於建立一個社會網絡。我們的活動為全球動員做好準備，使我們採取的行動規模與我們的危機規模相匹配。

XXI. 不以盈利為目的

我們的活動資金完全來自捐款和會員捐獻。我們不接受營利機構和石化燃料公司、藥物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大型銀行、私募股權投資、對沖基金、農業綜合企業和軍火工業代表的資金。

XXII. 我們不是非政府組織

我們的目標是團結，而非慈善。我們相信真正的改變來自人民的運動，而非慈善機構的仁慈。我們只對這些運動和從中成長的社區負責。

XXIII. 全方位抗爭

我們的聯盟反映了世界抗爭的多樣性。我們歡迎工會、政黨、運動、出版社、研究中心、鄰里協會，以及個別行動者的孤獨抗爭。這個聯盟的力量大於各部分的總和，足以重塑世界。

XXIV. 從每個人，到每個人

我們的會員模式很簡單：各盡其能，各取所需。我們期望會員以他們力所能及的方式參與我們共同陣線的建設。我們努力以會員抗爭所需的各種方式支持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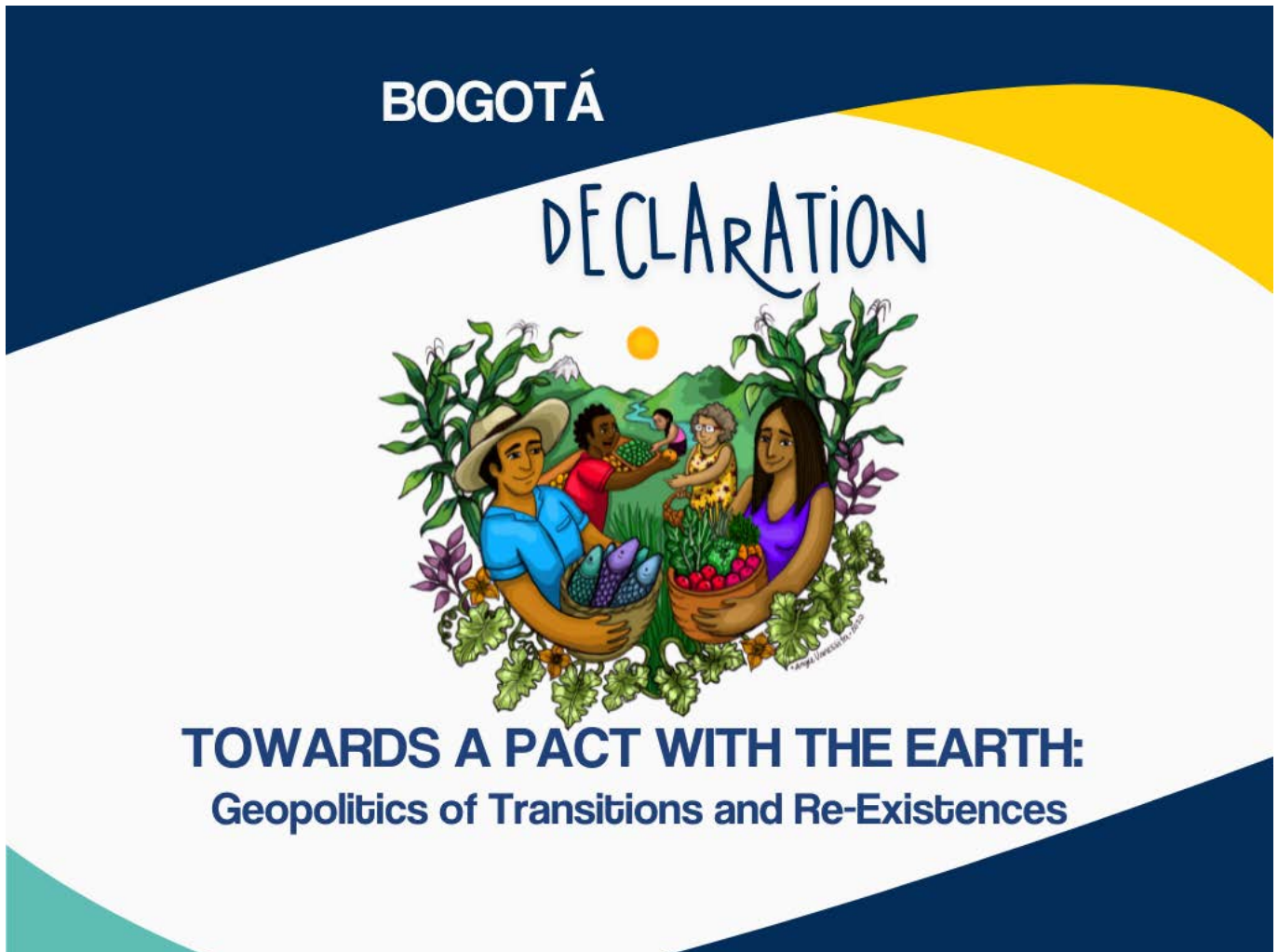
XXV. 團結不是口號

我們相信團結是一種行動。對我們的盟友表示同情是常見的。我們的任務是承認他們的抗爭是我們自己的抗爭，組織我們的社區參與這場抗爭，並跨越國界攜手合作，共同捍衛人類和地球。■

本宣言是在 2020 年 9 月舉行的國際進步協會成立高峰會後通過的。有關該運動及其倡議的更多資訊，請瀏覽 <https://progressive.international>。

> 波哥大宣言：地球公約

南方生態社會與跨文化公約



20

出處：[南方生態社會和跨文化公約](#)，2023。

COVID-19 疫情爆發後，「新的正常生活」對多數人來說象徵著混亂與不穩定。這種新的全球現狀反映出幾種相互關聯危機（社會、經濟、政治、生態、健康和地緣政治）的不斷惡化，而這些危機在我們討論社會文明層面上也是互相鞏固的。然而我們注意到，全球制度與民主的實踐正在減弱，同時極右和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在增強，各層面的文化戰爭也在延續，這與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父權體制和種族主義的加劇有著深厚的關聯性。

> 反對新的文化戰爭

在當前的歷史時刻，我們必須區分戰爭的不同層次。

首先是關於生命和自然的戰爭。多處地區的軍事化，以及日益增加的暴力正猛烈地摧毀著領土，而且這些暴力在婦女和大自然捍衛者的身上更是明顯可見。尤其是身為原住民的她們，或是在種族／民族被邊緣化的族群，特別是非裔族群更有可能遭受上述的暴力。而就全球與地緣

>>

政治而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實，同時也使能源、人道主義與糧食危機的情況惡化。此外，在帝國間相互對抗的背景下，核武的威脅也再度浮現。

同樣地，父權制度、種族主義、仇視跨性別和仇外的極右意識形態在全球發展擴張，加上政治體制逐漸被經濟問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左右，使得資本主義擁有了比人權和生命更重要的優先地位。上述形況，特別是在金融、碳氫化合物、農業綜合企業、軍火、汽車、企業媒體和製藥等行業。這些狀況反映了被資本所控制的生產部門，他們也對新自由資本主義的所產生戰爭和對人權與生命權的忽視負有最大的責任。因此，為了公正的生態社會轉型而努力，必然會涉及到捍衛民主的所有層面，從制度、國際、國家和地區政治領域，到自我管理、領土和地方自治形式的建構都非常地重要。

其次，戰爭正促使與企業「綠色轉型」相關的傳統和新形式的開發主義進一步惡化。現在，全球北方朝向所謂「清潔」的能源轉型，但這樣的轉型事實上是透過對全球南方的壓榨而來的。全球北方對全球南方的土地大力開採用於生產高科技電池的鈷和鋰，以及其他轉型所需之策略性礦產。此外，這種對全球南方的施壓開發也顯現在風力渦輪葉片所需的輕木需求，或是大規模太陽能發電場，以及氫燃料大型計畫新基礎設施所需的土地面積競爭。

近年來，不同的「綠色經濟」提案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它們是多樣化且具高度異質性的。然而，總體來說，它們已成為全球北方政治論述的框架，是為了減少碳排放並促進所謂「公平」與「永續」的經濟成長。氣候正義通常是這些綠色合約的核心宗旨，為從過去到現今人們對環境所造成負面影響的社區，提供分配補償的資金。但是，氣候正義往往局限於國內的願景。全球北方急於轉向再生能源，卻很少考慮到它們對全球南方的多重影響。

這是 Breno Bringel 和 Maristella Svampa 所謂的「去碳化共識」的出現：一個雖然主張改變能源來源（從化石燃料轉為「可再生」能源），但卻加深現存不平等並繼續將大自然商品化的過程。這個共識的目標是在不改變地球社會的新陳代謝模式（生產、消費、商品流通和廢棄物的產生）的情況下來實現去碳化，卻在無限期經濟成長之意識形態下，反倒加強了對自然資源的開發。

有鑒於此，我們重申近期發表在《南南生態社會能源轉型宣言》中提出的要求。我們也重申拉丁美洲和全世界迫切需改變方向，這也同時是基於人民抗爭的聲音和最近在本區域不同緯度所爆發的事件而要求改變的。具支配性的行動者們所提出的表面改變是遠不夠的。目前，即使是大型企業開始談論「正義過渡」了，並將「去碳化共識」本身視為目的，掩蓋了其重現相同累積、剝削和剝削邏輯的事實。我們必須揭開「綠色資本主義」新發展的面目，並以強烈反對，致力於徹底的能源轉型，同時承認與其他生命結構平衡互惠的存在模式，並為迎向更好的未來鋪路。

這項宣言想告訴人們，目前我們的當務之急是減少碳排放，但同時也要質疑目前資本的之於社會的新陳代謝。霸權的「轉型」計畫是基於企業、技術官僚系統、新殖民主義，甚至是無永續性的概念，這些概念不主張結構性轉型，更不用說當然也沒有納入計算地球所能承受之生態的極限。我們生態社會契約質疑這些方法，並提倡有必要將社會生態轉型植根於全球正義的邏輯中，這種邏輯對於生態轉型的霸權計畫具批判性與替代性。

> 我們的原則與議程

在波哥大，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之後的第一次面談中，我們認同以下原則：平等、正義與社會再分配原則；關懷、相互依存與生命永續原則；補償與互惠原則；以及民主、自決、多民族性、跨文化性與種族間的倫理原則。

我們也重申我們的目標，並建議延續下列主題和行動議程：

1. 我們致力於將社會中的關懷模式視為組織核心。

我們指的是所有形式的關懷：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自我關懷，以及對與我們共同生活且相互依存在地球上的非人類的關懷。關懷是恢復人際關係和生態系統之平衡的基礎。每個人在生命的某些時刻或階段都需要被關懷，這是生活在父權／新自由主義的論述中，人們被闡述為身為自主的個體這種敘事，所系統性忽略的一個面向。關懷作為福祉的一個重要層面，應該由社會中的所有成員（不論性別）積極承擔和分享，以解構原本女性被賦予責任的歸屬。也就是說，在父權體制下的婦女（尤其是貧窮、種族化、原住民，以及被邊緣化的婦女）幾乎承擔了照護的全部責

>>

任，並在影響生活條件的再生產領域中負荷了過多的工作。我們重申，照護應被視為生活與幸福的基本任務，並應受到承認與重視。此件事的重要性，在這次的疫情期間再次顯現出來。這且，再生產領域的中勞動並不會自動轉化為報酬，亦不會被納入市場或國家領域，許多形式的照護都存在於資本積累的領域之外。事實上，這是建構超越資本主義邏輯的社會的種子。正如拉丁美洲的許多經驗所顯示，集體或社區承擔照護與生命再生的某些方面，是建構公地的基礎。這也表示了，國家應該制定照護政策，以加強這些社區空間，且承擔更專業的照護責任，或促進照護系統的完善以此作為社福的核心。

2.我們認為，在全球南部公正生態社會轉型的框架下，**解決生態、內部債務和永續性的問題至關重要。**

任何氣候正義或社會生態轉型都是不可能的，若我們忽視了對上述債務的賠償和不公正制度的廢除。COVID-19疫情的流行突顯了債務問題，以及我們迫切需要實際解方的事實，這種解方不只是臨時或非常短期的減免。為了達成目標，我們有必要透過整體性的策略來**質疑及重新思考目前生態社會轉型的地緣政治**，以整體性、本體論的正義及賠償來保證所有人能有尊嚴地生活。霸權式的過渡性提案不但沒有減少地緣政治的差距，反而加深了全球北方對全球南部的殖民，以及生態債務的嚴重風險。為了能更進一步邁向具永續性的解決方案，我們有必要要求取消全球南方國家的外債、公民主導的審計，同時，我們也反覆譴責與外債相關的暴力與政府之腐敗。總而言之，我們的提案旨在將那些將生態債務賠償和取消外債問題視為重新思考國際金融體系重組機會，並將這些貢獻系統化，以環境和地緣政治正義的模式為基礎來達成我們的目的。

3.我們行動的開始，將作為一個生態社會和跨文化之契約。我們堅持，**沒有社會正義和環境正義的生態社會轉型是不可能的，因為社會和環境正義被視為一枚硬幣的兩面，其目的則是社會經濟轉型。**然而在短期內，一些過渡性的提案是必要的，包括引進**全民基本收入**，將公民權問題放在核心位置，並以**累進稅制**為基礎，以確保其可行性和正常運作。我們不該忘記，拉丁美洲國家的稅制是累退稅制，以間接方式或消費稅為基礎，主要影響了最弱勢的族群。包括出現率很低的稅源，還有巨額財富、遺產、環境破壞和財務收入等等，反倒都在國家稅制中很少出現。最

新數據顯示，拉丁美洲的逃稅行為造成近3,000億美元的收入損失（佔該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的6.1%），27%的財富如同位在避稅天堂，根本不需納稅。同時，疫情危機還進一步加劇了**不平等**。在我們的地區，前10%富有的人集中了55%的財富。從邏輯上來談，財富集中與污染相關，因為全球最有錢的10%人口排放了幾乎一半的溫室氣體。因此，引入全民基本收入是重新分配財富和減少貧窮的必要策略，但必須是朝向生活的非商品化、擴大免費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地的更全面轉型的其中一部分。

4.我們都知道，要拯救一個國家不僅僅只需要國內人們的努力。「氣候民族主義」和「國家主權」的論述往往掩蓋了生態危機更深層的問題。為了讓必要的政策對民眾產生實際的影響、平衡社會力量，並應當代歷史的重大挑戰，我們必須發展新形式的政治對話與區域合作。此外，意識到**公民社會的重要性**，且使他們參與其中。我們捍衛**多民族性和主權區域的整合**，以地方經濟為優先，目標是有選擇性地與全球經濟脫離。根據不同拉丁美洲組織的計畫，我們認為我們必須朝向建構區域財政協定的方向邁進，從根本上重新配置所有**司法管轄區**現行的財政制度。如此一來，才可使制度朝向公平的方向發展，為急需的社會與環境改革打開大門，以減少許多長期存在的**不平等**。少了這些改革，我們就沒有能實現公正和全面的生態社會轉型的一天。

5.短期內必要的過渡政策，必須加入當地的生產模式共同考量。我們必須針對**拉丁美洲目前的工業化進程**，以及他們成為**全球北方國家的全球工廠鏈的一環**這個後果提出質疑。那些充滿有毒毒素被犧牲區域的產生，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國家的特定區域發展工業，不只是以出口為導向的主要開發模式。而這種情況好可能擴展至更多國家，因為中國與美國對於拉丁美洲國家在「天然資源」與勞動力的爭論，只會使他們將繼續需要更多原物料，並加劇商品的剝削。

6.這個議題也讓我們思考，有哪些替代性的生產提案能讓我們邁向考慮族群倫理，並質疑以支配和剝削非人類生命體的權力關係的其他回應。我們目前的模式是以人類為中心，將非人類生物歸類為低等生物，並將其轉化為服務人類與資本主義體系的物品、產品與私有財產。舉例來說，畜牧業、漁業、製藥業、旅遊業和紡織業都將動物當作勞動力來剝削，或將他們轉變為產品，只重視這些非人類生命的經濟表現，卻罔顧他們的生活品質和尊嚴。

>>

7.生態社會轉型不能僅限於能源問題。同時，我們必須對能源系統、生產與都市模式，以及與大自然的連結進行結構性轉型：去集中化、去剝奪化、去商品化、去分散化、去國家化、去階級化、去種族化、修復與治癒。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讓我們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脫離以下這些產物與意識形態：化石燃料、對大自然的開發，以及發展主義與受黃金國(El Dorado)傳說啟發的想像。我們必須了解目前的社會生態危機不僅加速氣候變遷，也造成了多樣性危機(物種滅絕)和難以維持永續性的食物體系。

8.能源是一種權利，而能源民主則是維持生命網絡的基礎。生態社會正義應該以消除能源貧窮為目標，並且打破在社會中持續有優先權使特權群體獲得能源的這種權力關係。在短期內，化石燃料將成為一種過時的資產。在符合公正能源轉型的情況下，希望將化石燃料留在地下，並緩和(deescalating)碳氫化合物的開發(無論是新或舊形式)，上述做法都意味著意義上的斷裂，將大自然賦予更多重的定義，使它成為不只是人類資源的供給者的存在。

9.有效的去碳化是必要的，但它應該擺脫被商品化的困境，而不是仍在全球南部鞏固新形式的開採主義和造成更多區域的犧牲。我們必須注意「虛假的解決方案」，如可再生能源(鋰及礦產的轉型)，以及所有排放補償方案的限制和看見他們矛盾的部分。這些企業與國家在 COP 等空間達成共識，為全球南部實施具爭議性的能源模式，包括：綠色氫能、智慧農業、碳市場、地球工程，以及其他旨在維持全球北部與全球南部之現有不等權力關係的提案。

10.我們相信，單獨的公正的生態社會作為一個全面轉型的過程，不是、也不可能是對未來的承諾。轉型已經發生在農村與都市的社區與土地上，透過許多經驗以及世界各地的土地反霸權模式和錯誤解決方案的延續，而我們知道這是不夠的。我們急需規劃並加強這些與社區能源、農業生態計畫、都市花園、分散式發電及替代性經濟等相關的計畫來加強達成目標。

11.轉型的核心支柱是推廣生態農業，透過在城鎮建立並推廣生態農業綠帶改變農業食品體系，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並保證健康、安全且便宜的食物。此外，這將會因為生產和分銷系統的改變，從而也促進自治和糧食主權。這項計畫其目的在於賦予小農民和團結生產者所使用的當地生態農業市場的權力，以讓結社和社區文化更豐

富，並使公民感到對生產、參與式認證或保證系統和消費有(共同)責任。

12.多數我們生活的城市，是被投資房地產的計畫所影響和規劃的(另一面是房價的與都市缺乏綠地的問題)，此外，都市也同樣被以車為本的交通建設主宰(公共運輸不足且過度擁擠)。這種特性讓都市生活成為核心區域，而我們強調，這種大都市的生活方式應該徹底被改變，都市應該被郊區化。因為在大城市中，人們幾乎缺乏與大自然的聯繫。在南方生態社會與跨文化公約中，我們提出「生態正義城市的權利(right to a city with ecological justice)」，以改變我們在都會區的生活、飲食、行動及改善人與人之間互動的方式。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提倡一種新型的生態與民主都市主義，能夠在以下方面產生有效的社會環境改變：水資源的代謝(公平的水源與水源治理)、都市流動的動態性(改善廢棄物與污染管理、促進都市農業與直接與小規模生產者接觸，來推廣具流動且永續的當地健康食品)、都市基礎建設(無障礙空間、親近生態與可負擔的房價，以及解決社會空間設計所造成的種族隔離與貧窮問題、貧困、不平等、暴力等問題的循環)。

13.雖然當地致力於為生活而轉型、加強自治，以及要求國家在法律上、文化上、領土上和預算上尊重並保證這些都是必要的條件，但它們需要在不同的規模(區域、國家、拉丁美洲和國際)上擴大和加強。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們必須繼續向前邁進，找出並反抗共同的敵人，同時也要找出轉型鬥爭的共同論述與政治架構。國際主義和世界不同地區之間的經驗交流，是避免政治孤立和提供更強大的全球回應的根本。在這個過程中，重要的是要找出轉型鬥爭中不同類型的盟友，包括不同政府層級的行動者，但始終尊重生態領土鬥爭的主角地位。

14.最後，我們深信南方生態社會與跨文化公約其中的這部分：在法律上承認大自然的權利。換句話說，人類必須承認大自然是權利的主體(而非單純的客體)，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並尊重大自然的節奏與能力。這也意味著邁向關懷的倫理，在關係本體論及新的氣候挑戰的框架下，大自然與人類的互動須被定義為種族間的倫理。若能具備思考的多元性，以複數世界的角度來思考人類與其他非人類有知覺的生命之關係。

總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為建構一個真正公正的區域與全球轉型正義，而這需要大眾的參與

>>

和想像力，以及不同世代與類型、社會與跨文化團體、女性主義者與環保社會運動人士之間在議題上的交織討論。毫無疑問，這不僅需要對所有問題進行深度的辯論，還需在重新定義團結、互惠、平等、相互依存和生態依存的多邊主義的討論與地緣政治的基礎上，建立永久性的南北和南南政治對話。

南方生態社會與跨文化公約對區域內正在進行的改革過程抱持敏銳且開放的態度，對未來抱持憧憬、希望和力量。但當然，我們也意識到將我們往後拉扯的力量與寡頭政治的施壓。我們將繼續在複數世界中推動抗爭與提案、批判與另類方案、抵抗與重新存在。為此，我們恢復了近數十年來透過不同鬥爭而形成的基本敘事和概念，如：自然的權利、美好生活、重新分配的正義、關懷、正義過渡、自治、後開發主義、生態領域女性主義、糧食主權和自治，而我們將會始終與這些概念並肩而行。

我們不只是維護任何公約。我們的公約不是霸權的綠色盟約，不是主導者之間的協議和交易，而是與地球的公約。它來自於全球南方，也是為了全球南方，更是對地球上任何一片土地的承諾。■

波哥大宣言是在2023年3月在哥倫比亞波哥大舉行的南方生態社會公約年度大會之後起草的。有關南方生態社會公約的更多資訊，請訪問其網站或其X、Facebook 和 Instagram。

> 奈及利亞社會—生態替代方案宣言

奈及利亞社會—生態替代方案聯盟



出處：
Breno Bringel，奈及利亞阿布賈，2024。

奈及利亞正面臨著重大的社會與生態威脅。在過去幾十年間，該國面臨的挑戰急遽增加，在各個層面影響著奈及利亞人的福祉，乃至生命。儘管這個國家擁有世界上最舒適的氣候和最多樣化的生態系統，但由於氣候變化加劇、生物多樣性下降、污染和其他生態破壞，這些大自然的饋贈正瀕臨崩解。這幾十年間，不計後果而缺乏監管的礦產採集，以「城市化」和「工業化」為名的系統性環境退化，糟糕的政策制定和實施，以及日益嚴重的氣候變化影響，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這個國家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生態威脅。各方面的生態系統都在惡化，這個社群正處於危急時刻，未來也充滿了不確定性。

儘管這些威脅昭然若揭，奈及利亞聯邦、州與地方各級當局仍無動於衷，不顧當地人民的權益，不斷加速不計後果的開採以及系統性地破壞自然環境。

我們在此提出的《憲章》，是為呼籲奈及利亞社會—生態格局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其中提供了可持續、公平與公平的社會—生態秩序的願景與藍圖，並將人民的福祉與自然環境的維護視為首要考量。

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整個國家大部分的森林都消失了，空氣越來越有害，水源也受到嚴重污染。尼日河三角洲，這個過去充滿活力的生態系統，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破壞生態的碳氫化合物污染。沙漠化肆虐，乾旱已司空見慣；水體正萎縮、消失；洪患加劇、且更頻繁。有鑑於此，我們此時必須果斷、迫切地採取行動，《憲章》概述了一個計畫，來對應這些急切的挑戰。

我們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生態完整、社會公正，同時具有經濟福祉的奈及利亞。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新的奈及利亞，在這裡，自然的權利受到尊重，社群得以掌控自身的資源，並享有資源民主，每個人都能擁有乾淨的空氣、水和健康的環境。利基於環境正義、參與式民主與可持續發展原則，這份宣言概述了一個實現此一願景的途徑。我們設想一個奈及利亞，在此，奈及利亞人在他們的環境中推動變革。

> 奈及利亞社會—生態替代方案憲章的核心原則

《憲章》以下列核心原則與意識形態準則為基礎：

- **生態正義**——這個原則承認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對貧困和邊緣化社群的人民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並推動在國家和全球環境和氣候變化應對措施中，認識到

>>

這一不成比例的影響。

•**人民參與**——這個原則強調積極和有韌性的社群的出現，這些社群有權參與影響其生活和生態福祉的所有決策過程。

•**持續發展性**——這個原則承認原住民的韌性和知識，並提升他們在制定可持續的長期生態解決方案和實踐方面的能力、文化和技能，以保護環境並促進進一步的可持續實踐。

•**問責制度**——這個原則強調了企業和政府實體對其生態足跡負責的必要性。它建立在一種堅定的信念之上，即公司和政府必須遵守既定的不造成傷害的規定和原則，違反這些規定和原則時要受到懲罰，並對其活動造成的任何損害進行賠償。

•**團結與合作關係**——這個原則承認促進世界各地不同社群和運動之間的團結與合作的價值，其總體目標是為生態轉型和保護地球建立強大、充滿活力和團結的力量。

> 我們的訴求

一、乾旱與沙漠化

近幾十年來，奈及利亞北部各州越來越常遭遇乾旱。這些長期低於平均水平的降雨無法滿足作物和牲畜的用水需求，造成整體社會經濟福祉可怕的損失。受影響地區的原住民主要是農民，由於作物歉收和牲畜死亡，他們的收入大大減少。

乾旱還反應在可能對原住民造成危險影響的，嚴重的健康風險之上。用水緊張和缺乏足夠的營養導致營養不良等健康問題，特別是在包括兒童和老年人在內的弱勢群體中。乾旱導致的作物歉收和水資源短缺造成的總體貧困和不穩定迫使農村人口遷移，引發衝突並造成社會經濟挑戰。

氣候變化、過度放牧、森林砍伐和不可持續的土地利用方式，加上長期遭受乾旱的影響，導致奈及利亞北部幾個州出現沙漠化現象。這導致耕地流失，危及糧食安全和生計。有記錄顯示，沙漠化已經影響了前線各州約75%的土地，約佔奈及利亞總土地面積的43%。據估計，沙漠每年從奈及利亞東北部向西北部擴展600公尺。據同樣估計顯示，奈及利亞北部約50%的水體因乾旱和沙漠化而大幅萎縮。查德湖的萎縮也部分歸因於這些相同的根本原因。

至關重要的是，政府應立即採取適當措施，確保減輕乾旱和沙漠化對弱勢群體的影響，並採取其他政策措施扭轉這個趨勢。

與此一致，我們要求：倡議造林與再造林，協助社群適應變遷，以環境可持續性作為土地管理的首

要目標，以及發展水源涵養計畫。

二、洪水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DP) 的數據，洪水是奈及利亞最常見和不斷發生的災害。至少從2012年開始，奈及利亞就經歷了反覆出現且日益嚴重的糧食危機，為全國各地的社群帶來了毀滅性的影響。2012年的洪水是近年來最嚴重的洪水之一，影響了奈及利亞36個州中的30多個州，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並對房屋、基礎設施和農田造成了大規模的破壞。這一事件標誌著，該國所面臨的生態挑戰持續在加劇。

在隨後的幾年當中，嚴重洪水的模式持續存在，幾乎每年都發生重大事件。洪水通常是由長時間的強降雨、城市排水系統不良、森林砍伐和大壩放水所造成。2018年和2020年的地震破壞性特別大，影響了大片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這對奈及利亞社群造成深遠的影響。洪水不斷造成人民的死亡，家庭流離失所，道路、橋梁和學校等重要基礎設施遭到破壞。農業部門受到嚴重影響，農田被淹，作物被毀，牲畜損失，導致農民經濟困難，造成全國糧食短缺。此外，水傳播疾病和清潔水供應中斷都導致健康風險有所增加。

儘管這些影響正在加劇，但政府仍然未能設計出既有效又可持續的應對措施。當局的反應主要是提供基本的緊急救濟和預警。這些措施往往效率低落，不足以充分減輕洪水的影響。當洪水警報廣播時，沒有相應的協力得以支持需要搬遷和生存受到威脅的社群。

與此一致，我們要求：建設防洪基礎設施、保護濕地、重新安置重災區、經濟援助、改善簡單的預警系統以及應對氣候變化。

三、森林砍伐

奈及利亞是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據聯合國估計，每年有3.7%的森林遭到破壞。為了迅速擴大農業而開墾土地以及合法和非法砍伐木材——這主要與腐敗和執法不力有關。奈及利亞的森林覆蓋率從20世紀60年代的40%，急劇下降到不足10%。隨著森林砍伐速度的增加，今天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森林砍伐威脅到生物多樣性，加劇氣候變化，破壞水循環。森林覆蓋的減少不僅對野生動物產生負面影響，也對依賴森林為生的當地社區產生負面影響。

最近出現了對森林的新威脅。奈及利亞的森林日益被視為填補各州金庫的另一個創造收入的來源。這促使為了貨幣價值而砍伐森林的行為前所未有的增加。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全球緩解氣候變化的

>>

努力導致了新一波森林「商品化」和「攫取」它們，藉此產生虛幻碳信用額度的價值。以貨幣來評估森林的價值，就會陷入一種陷阱——如果自然無法產生經濟價值，就無需保護。

與此一致，我們要求：社群主動保護森林，結束自然的金融化，結束種植園擴張，重新造林。

四、水權

在全球，仍有數十億人無淨水可用，其中，有不成比例的婦女、兒童和社會底層等弱勢群體不得不承受這些痛苦，並需要花費高昂的費用來獲得這一必需品。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匱乏和稀缺性導致公共衛生、安全和人民整體福利的惡化。在包括奈及利亞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水權危機更為嚴重。在這些國家，經濟管束、基礎設施不足、新殖民主義陰謀、環境挑戰和治理的系統性失靈，使水權成為迫切的國家和環境的危機狀態，並明確體現了社會中嚴重的不平等。現在的奈及利亞，在水資源的公共所有權和私人控制之間的爭鬥中，關於水應該被視為一種公共產品還是一種經濟商品的爭論還在進行。

必須指出的是，資本主義結構的殖民強加創造了最初的條件，最終導致了奈及利亞目前正在經歷的水資源挑戰。這些政策促進了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的剝削，為後續將水作為商業資源來管理的後殖民政策開創了先例。氣候變遷的影響和大量的污染，特別是礦產與碳氫化合物開採的後果，都加劇了對供水的壓力。

我們大膽地宣稱，水權是倫理、社會和正義問題。我們注意到，奈及利亞是聯合國承認享有水和衛生設施的普遍權利（2010年第64/292號決議）的簽署國。此外，奈及利亞水體的污染是對自然權利的侵犯，自然權利承認河流、森林和生態系統是具有權利的實體。

據此，我們要求：下放水管理權，反對水的商業化，承認獲得淨水是一項人權，嚴格制裁污染水的行為，承認自然的權利。

五、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態恢復

奈及利亞擁有多樣化的生態系統，從熱帶雨林和稀樹草原，到沿海紅樹林和濕地。這些生態系統蘊養了各種各樣的微生物、植物和動物，包括許多地球上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物種。奈及利亞有超過864種鳥類、117種兩棲動物、203種爬行動物、775種魚類、285種哺乳動物、4715種維管植物和許多未記載的物種。

而奈及利亞的生物多樣性受到工業化農業（特徵

是過度使用農用化學品、過度耕作、單一栽培等）、森林砍伐、土壤退化、污染、自然資源過度開發和氣候變遷的嚴重威脅。其他風險包括人口過剩、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經濟發展不佳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法律和政策效率低下。

為了應對農業產量的下降，政府允許使用基因改造生物體（GMOs）和化學肥料以及殺蟲劑，這進一步破壞了生物多樣性和環境。多年來，奈及利亞農業部門對農用化學品的依賴一直在增加，奈及利亞有80%以上的農民目前使用無機農藥和化肥。農民不知道這些農藥的成分，而且往往不按照規定使用。

我們要求採取並且推廣生態農業，以解決該國面臨的生物多樣性挑戰。生態農業是一種全面而綜合的方法，同時將生態和社會概念和原則應用於農業和糧食系統的設計和管理。它優化了植物、動物、人類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也解決了對社會公平的糧食系統的需求，在這個系統中，人們可以選擇自己吃什麼，以及如何和在哪裡生產。

與此一致，我們要求：走向生態農業，增加對小農的支持，建立《生物多樣性公約》，採取預防原則，保護保護區，取消所有植物種子和食物的專利權。

六、礦業與固態礦產

儘管奈及利亞在各處開採錫、鈮鐵礦、鉍、黑鎢礦、鉛、鋅、金、煤等礦物，但其對奈及利亞經濟的貢獻卻微不足道。奈及利亞的礦產開採僅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3%。然而，近年來，奈及利亞政府積極尋求通過振興採礦業，使其經濟多樣化，擺脫對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政府的推動帶來了一系列新措施，例如藉由監管改革，將採礦制度納入法規當中，如2007年的《奈及利亞礦產和採礦法》和2011年的《奈及利亞採礦條例》。

近期，人工小規模礦產採集在該產業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這種採集主要使用原始技術從次生和原生礦石中收集和提煉金屬和礦物。人們因為貧困而參與此種非正式採集，而這樣的採集方式不僅會破壞環境，也對工人以及社群的健康和安全造成威脅。無論是人工採礦還是政府批准的大規模採礦活動都具有相同的負面影響。礦產採集對環境產生各種影響，包含土地退化、侵蝕、生態擾動、自然植物群的破壞、空氣、土地和水的污染、健康風險和輻射危害。

開發、採集固態礦物主要造成的全球性問題，是其對氣候變遷的影響。在它們的放射性衰變過程中，某些礦物會自發地衰變，釋放輻射以及會對全球溫度產生負面影響的多餘能量。固態礦物的開發和採集本身也會產生有害氣體，例如甲烷，而這可能會造

成火災以及危害環境。

為了開發與採集固態礦物，需要清除大量的地殼植被和植物。裸露的土地相對於覆滿植被的土地，更容易受到沙漠侵蝕，並對人類、動物、植物、農業生產力、土地使用／規劃，特別是瀕危物種產生負面影響。土地退化的影響包括風化、侵蝕、溝壑形成和塊體運動，這些都是開發與採集固態礦物會面臨到的重大挑戰。這些問題可能源於礦山尾礦、垃圾場、過度的挖掘、廢棄的礦坑以及未能恢復開採過的土地。

有毒、致癌和其他有害金屬以及礦山傾倒和尾礦會隨著礦產採集而破壞生活環境，對人們的健康、生活和文化行為造成負面影響。這些污染物會污染空氣、水和土壤，對人類、動物和植物造成傷害。在Zamfara州——金礦開產地，人們接觸到汞而損害中樞神經系統，導致眼睛、皮膚和胃炎等問題；呼吸系統疾病；失眠；易怒；無力行動；頭痛；虛弱；以及體重下降。

為了解決這些弊害，我們要求：確實執行採礦法規，給予受到影響的原住民自由、優先和知情同意的權力；對奈及利亞的礦產進行適當研究；遵守國際最佳做法，包含除役和禁止採集區。

七、能源轉型

全球能源工業佔據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73%，是溫室氣體排放的最大來源。因此，能源轉型應側重於從具有高排放量的能源，轉向風能、太陽能和水力等可再生能源。目標必須是從源頭上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以便大力減緩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奈及利亞與其他國家一同制定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這些目標被列入各個國家發展框架中，例如2021年國家自定貢獻（NDCs）的目標，是在206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能源轉型對於實現可持續的未來至關重要。然而，有些問題在能源轉型的全國對話中並沒有被解決。首先，轉型的必要性是一個與正義相關的議題。奈及利亞和其他受氣候變遷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其對造成氣候危機的歷史排放量是最小的。在這方面，歷史上排放量最大的國家必須承擔能源轉型的最大責任，包括提供資金。因此，我們對轉型的態度必須從正義的角度出發：它必須解決歷史上的傷害，創造補救的空間，並滿足社群的能源需求。

奈及利亞面臨的一個重要困境，是如何獲得人民烹飪時所需的能源。木質燃料是許多奈及利亞人的主要能源來源，超過70%的家庭依靠它來做飯和取暖，特別是農村地區，因為那裡難以獲得替代能源。由於需要砍伐樹木以用作柴火，木質燃料的使用助長了森林的砍伐。砍伐森林反過來又減少了可吸收二氧化碳的樹木數量，從而增加了大氣中的碳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尋求所謂的轉型礦物以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絕不能強化了與過往礦物燃料採集時同樣的不平等和濫用。奈及利亞必須有意識地避免陷入另一種重現同樣的剝削性生產關係，並在全國範圍內擴大犧牲區的能源途徑。

與此一致，我們要求：包容性政策制定和利益相關者參與、工作轉型、薪酬、環境修復和乾淨能源的獲取。

八、石油與天然氣的開採

1956年以來，尼日河三角洲不斷地進行石油的商業開採。從最初的幾口陸上油井開始，石油開採業務迅速擴張，活躍的石油開採地點遍布於尼日河三角洲和拉哥斯州。由於石油以及天然氣大規模的探勘與開發，尼日河三角洲是一個巨大的油氣田。該地區的探明儲量為192萬億立方英尺，佔據全球天然氣產量的絕大部分。該地區的石油和天然氣開採為奈及利亞創造了巨大的機會，使其在國家與地方都賺取了巨額收入。

儘管有鉅額的碳氫化合物收入，但在尼日河三角洲地區進行開採的社群條件卻驚人的糟糕。生活在這個石油和天然氣產區的4000多萬人並沒有從他們的土地、河流和小溪下面所開採出的大量資源中受益，這些收入非但沒有改善福利、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和安全，反而造成了不尋常的貧窮、衝突、壓迫以及未開發的狀態。

該地區的主要問題是由輕率的碳氫化合物開採行動所造成。例如，奈及利亞每年生產的35億立方英尺伴生氣中，有25億立方英尺（70%）被燃燒掉。伴生氣直到現在依舊持續燃燒，這並不是因為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而是因為石油公司和奈及利亞政府不願停止這種行為。石油公司尤其認為，繼續燃燒天然氣比建立管理天然氣所需的基礎設施更便宜、更方便。終止天然氣燃燒的最後期限持續從1979年推遲到2030年，甚至可能是2060年。即使在法院判決宣布天然氣燃燒是非法行為之後，政府寧願石油公司支付微不足道的罰款，也不願採取任何實際行動來結束天然氣燃燒。

碳氫化合物產品從不同的提取點到港口，再從港口運往歐洲、美國和其他地方，導致長達7000公里的管道被埋在尼日河三角洲的土地、沼澤和河流下面，有時就在人們的農場和後院。某些管道已經埋了40多年；由於管道的老化與腐蝕，管道時常破裂，這個現象令人擔憂，泄漏的原油破壞了農作物，毒害了河流，污染了溪流，使整個社群流離失所。更糟糕的是：有時破裂的管道會在大火中爆炸，燃燒數天，燒毀整個社群和他們的生計。

隨著近70年的石油開採而來的，是對環境、生計和人權的毀滅性影響。在尼日河三角洲經營的最大的跨國石油公司——殼牌、埃克森美孚、道達爾能源、雪佛龍和埃尼——已經制定了完善的計劃，例如出售資產、進入更深的水域、或干脆離開該地區。當他們離開，奈及利亞公司買下這些石油巨頭留下的油田時，沒有規定誰需要對歷史污染和相關的社會生態問題負責。當企業撤資、當地企業接手時，它們都立即否認對歷史損害負有責任。對於石油生產和受影響的社區來說，撤資意味著讓公司對污染負責的可能性變得更加遙遠。

由此，我們要求：對尼日河三角洲進行環境審核；對災害作出緊急措施；石油公司撤資。

本宣言於2024年6月20日在阿布賈舉行的奈及利亞社會—生態替代方案聯盟會議上發佈。《憲章》是現存的檔案，奈及利亞人民將不時對其進行審查，以確定政策制定者的回應程度，並確保其對人民和環境的重視。

> 歐洲新國際主義宣言

ReCommons Europe



出處：[ReCommons Europe](#)，2020。

歐洲機構（整個歐盟和歐元區）在結構上是新自由主義、不民主且不平等的。它對於滿足各國民眾各種階級的需求、要求與權利，以及各成員國人民之間的團結與平等來說是一種障礙。在對抗競爭邏輯，以及從生態轉型的角度來看，歐洲各層面的鬥爭和建立另類方案就顯得格外地重要。

我們希望將歐洲變成我們共同的家園，但在目前的框架下這還是個遙不可及理想。因此，我們提出一個方案，這個計畫需依賴地方、國家和跨國層面的社會鬥爭，以不服從、打破不民主的手段對抗在歐洲的資本主義機構，並以全歐洲與民眾合作的民主機構取而代之。

> 共同歐洲「反叛」情境的主要特徵

1. 我們需要立即透過在地方、區域、國家和歐洲各層級政府來處理，這些特定事物或議題（例如債務、移民政策、生態過渡、與全球南部包括「東歐」的新殖民協議等）的協調與合作，以此導向的長期合作的平台和不服從運動，來實現另類社會、環境和政治之目標。不同的政治社會運動者都應該對歐盟的條約、指令和決定展開不服從行動。他們也應該讓世人知道，這些行為的目的是為了實施替代政策並建立新的長期合作（是關於所有的特定事項）。

這種不服從行動可以基於現有的社會抗爭和運動（範圍擴所有領域，如勞工權利、貨幣政策、反種族主義等）。它也應該盡可能地展示在歐洲實施民主、環境和社會目標的實際潛在效率，與現有的條約和新自由主義政策是相互矛盾的事實。即便一個政治社會運動者是孤立的，但他們仍然可以透過使現有的政策和機構失去合法性的方式，以

替代的解決方案來抵抗原有制度，並在所有可能的層面公開提出人民合作和組織自治的新形式。

2. 國家層面的現有抗爭應強調在抵抗國家統治階級所主導之的政策，以及在與歐洲主流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制度之間的互動的方向上。為了打破資本主義霸權的情況，民眾的諮詢與群眾動員應該著重於倡議實現具體的目標，以及為了對抗歐盟統治階級與機構而提出的相應方案。這裡所指的對抗，也包括實施防禦工具，以對抗歐盟的反威脅和攻擊，抑或政治攻勢的倡議；對抗的目標是為動搖新自由主義的陣營，並為其帶來擁有政治合法性的危機，並妨礙這些歐洲機構的運作。政治社會運動者必須儘快透過單邊措施來實施這些方案，例如：在審計期間暫停償還債務的方案；在特定稅收基礎上創造更多工作機會的公共政策方案；控制資金流動的計畫；或一些與特定社會抗爭和族群合作的社會化/國有化需求計畫。

即便一個政治社會運動者是孤立的，它仍應自行實踐這些計畫，並透過呼籲整個歐洲（而非僅在其地理區域內）的民眾動員。此外，也邀請其他社會運動者為這個試圖將歐盟機構去合法化之過程做出貢獻，造成他們機構的政治危機。

3. 這些防禦性的工具和具攻擊性的政治主張，必然涉及國家層級的公民政府與歐盟條約和機構的決裂。公民政府所採取的所有措施，都需要至少在國家層級上，與現有的主導性的歐洲政治和規則分離。我們必須清楚表明，我們所捍衛的並非基於「國家利益」，而是基於政治、社會、環境和民主的理由；並且，這些理由關係到目前歐盟內外的所有民眾。

>>

我們捍衛民主控制的貨幣體系和貨幣的絕對必要性，因此也捍衛銀行社會化和控制資金流動的必要性。這些措施與歐盟的條約和經濟貨幣聯盟 (EMU) 相衝突。民眾政府可決定退出歐洲貨幣聯盟及/或歐盟 (例如援引第 50 條)，或接受被驅逐出歐洲貨幣聯盟或歐盟的挑戰。

> 啟動制憲程序

制憲程序必須在所有可能的層面上被啟動，旨在於歐洲建立與目前制度相左的方案，並發展新的政治合作可能。這個理想必須建基於一個共同的公眾平台，以對抗歐洲和當地統治階級和機構，以及排外主義的抵制。當然，這樣的制度也須是有利於工人與所有弱勢階級的社會權利，以及重視對於環境的保護。

我們無法預測詳細的情況，但舉例來說，一個由協會、反叛城市、地區或國家所組成的聯盟，可以發起一個「反叛選區程序」(關於全球或特定的功能特權)，甚至開放給從一開始就沒有參與不服從程序的政治空間。這些制憲程序，依據相關情境與層級(從市政論壇與網路，到與國際主義平台相關的國家或歐洲層級的制憲大會)而有不同的形式，啟動這些程序是為了創造新的合作，促進尚未開始此一程序的鄰近政治行動者的破裂過程，瓦解「歐洲堡壘」(Fortress Europe)，並最終在歐洲與國際層級創造替代性的機構。如果某個政治行為體處於孤立狀態，它應該為相關領土或功能發起這個「反叛組成程序」，並建議其他行為體加入這個程序。

> 提案：應立即採取的措施

前述的每一點都需要即時的行動。主要的要求是關於集體設計和民眾取得必要的特定工具，並以不服從、對抗和啟動組織程序，以及聚集可以運作這些程序的社會和政治力量為主。

我們建議所有的進步力量(工會、政治組織、協會、社會運動參與者等)皆採取相似的目標：共同加強對資本主義的抵抗、對不民主的歐盟機構的批判，並共同提出具體建議以打破這些機構的霸權，重建新的民眾合作形式。此外，還需更新、分享與普及相同的文本，例如 *Alter-summit* 宣言與 *ReCommonsEurope* 宣言；鼓勵在地方、國家與歐洲層面發起所有重要的倡議，以支持「反叛的選區程序」。也利用歐洲選舉的機會，去影響舉辦政治活動與激發民眾辯論，告知民眾目前有何可參與的倡議與可替代舊有制度的改善空間，並將社會與政治力量聚集於此。■

本文轉載了《歐洲新民眾國際主義宣言》(*Manifesto for a New Popular Internationalism in Europe*) 的第九章(歐洲的社會抗爭、政治對抗和組成程序)(略有改動)。該宣言最初於 2019 年 3 月提出，由一群來自歐洲十幾個國家的活動家和研究人員所起草，希望提出一個藍圖讓人民和左翼力量有所行動。它是 *ReCommonsEurope Project* 的一部分，由兩個國際網絡 (*CADTM* 和 *EReNSEP*) 以及巴斯克工會 *ELA* 發起，目的是為歐洲人民左翼內部正在進行的戰略辯論做出貢獻。

> 超越差異： 多元世界中的相似性

Lidia Becker、Christine Hatzky，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德國



出處：Anderson Guerra，2018，在Pexels。

當前是環境災難、戰爭、去團結化和科技進步快速的時代，未來全球的走向令人難以預料。在新自由資本主義下，人和物被剝削的事實都變本加厲，也加速許多地球上人類與非人類的遷移與滅絕。鑑於目前地球所面臨的這些挑戰，我們認為應該「超越差異」(beyond difference) 來分析這些挑戰，並依照 Anil Bhatti 的著作，發掘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相似性，並以此作為中介來激發這些概念發展的潛力。

> 多元性：親屬關係、平等與相互連結

在具批判性的後殖民主義與性別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差異性，對於解構不平等與階級制度非常有用，但卻忽略了對相似性的認知，也就是對於關係、類比、聯想、同時性與空間，這些具共鳴與凝聚力建構社會實踐的先決條件。安地斯山脈地區的原住民哲學 Sumak Kawsay 或 Buen Vivir 以多元性的形象，透過連結進行思考，以克服殖民與父權結構的實踐。在「多元世界」(pluriversal world) 中，人類與非人類(合法性)主體的社會秩序應在平等的基礎上共存。地球不被視為一種資源，

而是一種給予、一種生命的存在，且在這個世界觀中，萬物皆為相互關聯的存在。

多元性的概念源自過程本體論，涉及強調人類與自然的共同成長。在英美及歐洲地區發展的具批判性的後人本主義，也提出了相似的概念，從過往區分人與非人類的觀點，轉變為強調人類與非人類實體之間的親屬關係。這樣的參考了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的非殖民與非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但相較之下，它更重視地球未來的科技發展。與此相關的是關於地球可居住性的討論，「地球人」在這個星球上有生存的機會，而囊括了其機會與危險的雙面特質的人類科技，在這個星球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相似性的概念變得重要，因為科技發展讓機器與人類越來越相似，並加強人類創造力的矛盾性。

> 少囉唆!多談差異,少談相似

對於以相似性為基礎來分析非人類中心的多元性概念與後人類主義方法之間的關係，有某些研究文獻是有

>>

關的。第一類是在拉丁美洲所討論的觀點，以各種原住民宇宙論（由 A. Escobar、M. de la Cadena、M. Blaser 和 A. Krenak 等人所著），以及在拉美研究中所探討的共生（由 Sergio Costa 提出）與共存的概念為基礎的觀點。自古以來，在哲學與科學歷史的討論中，相似性的認知一再被強調為人類基本的認知功能，以及提供方向的實踐（如模仿、仿效或模擬）。然而，有關相似性的討論近期才出現在有關文化理論與文學研究的辯論中，而且至今仍未發揮足夠其在認知學研究方面的潛力。

除了這些仍然含糊不清的方法之外，我們希望讓相似性的概念在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範式轉移中發揮效用，並借鑒前輩思想家（B. Spinoza、G. Leibniz、G. Tarde、W. Benjamin、Marcuse 等等）的觀點以此構成第二類研究文獻的基礎。到目前為止，人文與社會科學主要是以差異性為主要研究方向，這些有關差異性的理論基礎構成了第三種，也就是結構主義，尤其是後結構主義的概念（M. Foucault, J. Derrida, G. Deleuze）。以差異性為基礎的觀點，反映在後／去殖民主義與批判現代性之討論中（D. Chakrabarty, F. Coronil, S. Hall, R. Grosfoguel）；而性別與同性戀研究中討論，則共同構成第四個研究階段的範式轉移。在以跨學科為主線的領域中，第四階段的研究學者也成功地發展了差異性分析的概念，在交叉性的概念下，以解構全球層面的複雜不平等現象（G. Spivak, M. Lugones），並捕捉到不平等在不同層面的上糾葛。有關黑人／有色人種的女性主義的工作（B. hooks, K. Crenshaw），則是在對於性別框架的意識上，鋪陳了能更加深入理解特定種族和階級的重要道路。

以差異性為基礎的身分認同建構，從 1990 年代開始在全球辯論的過程中受到批評，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文化面向上是以本質主義的方式來理解，意即他們拒絕其他更多可解釋空間（S. Hall, H.K. Bhabha）。這種身分認同建構的方式，是「西方文明」文化優越性觀念的核心，其基礎是「自我」與「他者」這種簡單又武斷的身分認同建構，被支持基本教義與身分認同運動的群體所接納。但，這也就是為什麼以差異為基礎的認同概念是值得商榷的原因。我們認為，即使是以差異為基礎、以人類為中心的概念，也需要透過非本質主義的方式來理解。

> 多元性與擴展認識論之間關係的最後一環節

氣候變遷和生態系統的破壞對地球生命所造成的威脅是顯而易見的，這樣的狀況即源於在啟蒙運動（理性化）的過程，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聯繫被區分開來了（B. Latour, P. Descola），這樣的觀念並在現代社會學中被一再鞏固。在此，我們上述所提的相似性的概念也有助於克服這種自然與人類／文化之間殖民式的二分法，並將人類理解為更大的複雜網絡中的一部分。

這是第五項研究的基礎，包括新物質主義（K. Barad）、後人類主義（D. Haraway, R. Braidotti）、肯定性生物政治學（V. Borsò）與科技女性主義（J. Wajc-

man, F. Costa)。這些概念都開放給解殖取徑的方法論與非西方的宇宙論使用，這也所謂我們在討論複數思維時的關鍵觀念。同時，非洲哲學也處理技術殖民性、技術、自然和人類的複雜交織狀態；他們嘗試辯論在一個多元世界中，討論非殖民技術的可能性（A. Mbembe）。

所有上述研究方法的共同點是，它們皆重構了宇宙、地質、技術與人類之間的共感關係。相對來說，其他方法則亞洲哲學與量子物理學的發現，以及其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適用性（K. Fierke），從而開啟全球知識生產的多重連結。與科學與技術研究相反，技術殖民地角度（R. Camarena et al.）的特點在於其聚焦歷史與基於地域專業知識的解殖過程，以及對「科技技術」（technology）的擴大理解，例如將識字能力視為殖民的一環（W. Mignolo）。

我們計畫的特點在於由互補的觀點，討論並系統化發展這些不同的全球認識論。而這個認識論都是以關係的角度來思考，目的在於闡述一種新的非人類中心主義的概念，以看待自然、人類與科技技術之間的流動關係。

> 新(舊)本體論、科技批判與解殖主義的相似性

1. 自然：現代社會在文化與自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劃界，是西方認識論的基礎，也是在殖民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從人類與非人類主體之間的延續性與互惠性層面對其提出質疑。我們透過把對人類與自然資源的剝削合理化這事情二分法，並以關係對上複數世界的觀點進行對比，這樣的比對方式來自拉丁美洲的哲學，以及近代所討論的「扁平本體論」其之內在固有觀點，也是同時具微觀與宏觀、具有包容性思想。

2. 技術：科技技術的進步是為了開發與剝削外在的自然和人群，是殖民主義的另一個基礎，也是父權體制的縮影。新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滲透，以及當今人類與科技的融合，喚起了我們對科技殖民的合理懷疑。例如，透過通訊科技的監控功能。然而，社會設計的可能性回擊了這種懷疑。後人類女性主義將有機生命，以及包括科技在內的非有機物質交織在一起，並將他們定義為一種組合，意即他們對於科技技術成為我們生活中決策主體的現象，提出了質疑。

3. 人類：重視多元形式的社會，解構人類社會舊有的分類框架（以男性、異性戀和白人作為準則的框架）。我們應優先考慮在不同群體之間創造共同性，超越差異和外來性，達成群體共融與團結的目標。我們要討論的是，從殖民主義開始、到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持續的剝削他者與自然資源的行為，究竟在多少程度上造成了現今社會的差異性與生態危機。與此同時，歷史和當代社會脈絡也承受著被同質化的風險，例如：該如何抵抗極權體制排斥多樣性的現象，就是其中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

我們概念是創新且具發展性的，透過多元性的過程本體論概念，以及基於相似性觀點並透過一步步實踐的後人類方法，來進行跨學科的連結。我們將兩者結合起來，從連續性的觀點來發展自然、人類、科技技術之間關係的新概念。複數性與後人類的觀點在處理西方現代性的概念、其普世主義以及其他與他們相關的概念時，也共享了對於後結構主義、後/解殖主義這種以「差異」與「另類」為基礎研究方法的批判。按照現代性、理性、殖民性的邏輯，現代世界由階層制與本質主義的二分方式組成（自我／他人、白人／黑人、男人／女人、文明／野蠻、主體／客體、心靈／身體、文化／自然、差異／相似）。

因此，差異性被宣稱為與卓越的知識組織同等的範式典範，而相似性與模仿則在西方認識論的觀點中被視為「不科學」，因而被排除在外。因為它們被認為是「原始的」（primitive）、「魔法的」（magical）、「接近自然的」（close to nature）與「前現代的」（pre-modern）。相對來說，我們的方法論將關係性的相似性概念，整合到解殖的範式中，擴展了對世界的多元認知，包含了對技術的批判，並超越了以差異性為基礎的知識生產現況。■

來信寄至：

Lidia Becker <becker@romanistik.phil.uni-hannover.de>

Christine Hatzky <christine.hatzky@hist.uni-hannover.de>

> 委內瑞拉與孟加拉的控訴：獨裁者何時放棄？

John Feffer，政策研究所，美國



| 出處：Shutterstock.

在某個國家，執政15年、日益獨裁的領導人被由學生領導的反對派拉下台政壇。在另一個國家，這位統治了11年、日益獨裁的領導人，在近期的選舉中操縱選舉，使自己險勝，在遭到抗議時拒絕請辭。

第一個國家是孟加拉，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Muhammad Yunus 領導的臨時政府取代了目前（再次）流亡印度的總理 Sheikh Hasina。與此同時，在第二個國家委內瑞拉，Nicolas Maduro 抵抗了美國、歐盟和其他國家要求他下台（如果不是國家的話）的呼籲。

為什麼反對派在孟加拉取得成功，而在委內瑞拉卻沒有？兩國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政府的制度權力、各自的石油儲備規模、與美國的鄰近性。但或許最關鍵的區別是時間。Maduro 很可能只需要幾天、幾週或幾個月就會遭受和 Sheikh Hasina 相同的命運，也許他只是還不知道而已。

> 孟加拉驚喜

Sheikh Hasina可能認為她的政權不可能受到撼動。作為孟加拉長期任職的總理，她擁有足以保護她的血統。她的父親領導了反對巴基斯坦的獨立運動，成為該國的第一任總統，被稱為「國家之父」。她也有理由相信她的任期會順利持續。孟加拉的經濟在過去15年（包括2020年新冠疫情年）持續上升，在此期間，教育機會、兒童健康和總體預期壽命都有所改善，貧困率也降低了一半。

再來是Hasina在地緣政治上的敏銳度。她擁有鄰國印度的 Narendra Modi 政府這個強大的盟友，也能夠與中國保持相對良好的關係。

當然，她也有反對者。她將一些國內的反對者關進了監獄。她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國家的年輕人成功翻盤。

>>

首先，有大量的孟加拉年輕人離開了這個國家。2023年，[超過五萬名](#)學生出國接受高等教育。在社會經濟光譜的另一端，超過一萬五千名孟加拉移民在[2022年艱難地穿越地中海前往義大利](#)，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孟加拉媒體不斷在討論「人才外流」的話題，而評論家也試圖找出留住本土人才的方法。

當然，Hasina也擔心人才外流。但是，每有一個年輕人離開這個國家，在街頭抗議政府政策的年輕人就會減少一個。在失業率[超過15%](#)的情況下，孟加拉年輕人因無法享受過去15年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而沮喪，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有一個選擇是去海外尋找更好的機會；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的另一個選擇是前往公務員部門，政府的工作薪水很不錯，而且工作有所保障。

不過，政府多年來一直試圖藉由將近三分之一的工作機會分配給1971年參加該國獨立戰爭的退伍軍人的親屬，來減少工作缺額。要記得：總理的父親是一名獨立鬥士，這是對那些重要支持者的一種獎勵。

學生們在2018年成功阻止了這一個新的供養制度，但政府今年再次嘗試通關，年輕人再度重回街頭。到2024年8月初，共有[數十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這是新一輪的反政府抗議行動。儘管最高法院大幅度地淡化了配額提案，但學生們持續施壓，直到總理辭職並逃離該國。

這一結果與2014年烏克蘭發生的事情驚人地相似，當時，年輕人等人在基輔市中心舉行示威，反對腐敗的總統Viktor Yanukovich。Yanukovich 還與鄰國的威權領導人建立了緊密的關係。Yanukovich 隨後逃離了他的犯罪現場，逃往俄羅斯，住在他據說花了5000萬美元買下的一棟房子裡。

當然，沒有人想再製烏克蘭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戰爭、領土損失、經濟破壞。為了避免重蹈烏克蘭的覆轍，孟加拉將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新過渡政府的努力。

幸運的是，孟加拉組建了一支才華橫溢、包容性強的團隊，其中包括臨時總理 Muhammad Yunus，他是孟加拉鄉村銀行的經濟學家兼創始人。Yunus 一直是 Hasina 政府的目標，Hasina政府曾指控他犯下貪污與其他罪行。但這位小額借貸行動的創始人主要的罪行是與 Hasina 政府相處不融洽。

臨時政府的其他成員包括兩名學生抗議領袖 Nahid Islam 和 Asif Mahmud，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因為在這種過渡時期很少有年輕人能夠掌權。其他成員包含「人權活動人士、

法律專家、兩名前外交官、一名醫生和一名孟加拉央行前首長」。這群讓人耳目一新的非政界人士的主要工作將是穩定國家局勢，並為新的選舉做好準備。

> 委內瑞拉不意外

受夠了Nicolas Maduro和他的竊盜統治方式的不僅僅是學生。根據選舉前的民意調查和反對派在選區收集的選舉後結果，超過70%的人口希望推翻 Hugo Chávez 的接班人。委內瑞拉不意外的是，Maduro宣布自己贏得了（對他來說）看似合理的51%的選票。

委內瑞拉出現了抗議行動。與孟加拉一樣，政府試圖透過殺人（[超過12人](#)），以及監禁反對者（[至少2000人](#)）來鎮壓反對派。政府發佈的「敲敲打打」活動的影片中，有[恐怖電影配樂](#)，歌詞是：「如果你做錯了，他會來找你！（……）他會來找你！你最好躲起來！」反對派呼籲在8月17日舉行國際抗議日，希望以此吸引居住在國外大約800萬委內瑞拉人中的多數人參與抗議。

但與孟加拉有兩個主要不同之處。在委內瑞拉，反對勢力以政黨為核心。其成立的目的是選舉，而不是推翻一個非法政府。相對於動員人民上街頭，這個政黨更善於動員民眾投票。與其他成功的反對派行動——比如烏克蘭、塞爾維亞或菲律賓的反對派運動——不同，它並未發起任何如罷工、道路封鎖等不服從運動。

第二，委內瑞拉的反對派是由老年人領導，其總統候選人Edmundo González今年已74歲。然而，真正的權力掌握在María Corina Machado的手中，56歲、正值壯年的她已經是政界老屁股了。她在抗議的方式上很精明，也知道委內瑞拉反對派的侷限性。

相比之下，孟加拉的年輕人都是菜鳥。事實證明，這正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他們擁有無知的力量。他們不知道這些抗議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最高法院確實廢除了糟糕的配額制度後，他們仍然在抗議，抗議，持續抗議。他們團結一致表達訴求——Hasina下台——儘管他們並不認為這真的能發生。

孟加拉的抗議行動是由無限的理想主義推動；委內瑞拉的抗議行動則受到經驗豐富的現實主義的啟發。有時候成功需要的是感性，不是理性。

> 時間到了？

在 Sheikh Hasina 逃離孟加拉的前一天晚上，她的軍隊首領決定不執行向平民開槍以實

>>

施宵禁的命令。這種巴托比式的拒絕參戰——我們軍隊不願參戰——可能是導致政府垮台的決定性因素。不過，軍隊仍然是臨時政府背後的力量。

但請記得：實際上，正是學生們的決心使得孟加拉軍隊改變了立場。到目前為止，沒有跡象顯明委內瑞拉軍隊有計劃做出相似的行動。反對派向軍方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勸說軍方放棄Maduro。但就在一天前，這位委內瑞拉領導人與軍方官員一起公開露面。「永遠忠誠」，他們齊聲高呼，「永遠不做叛徒。」

即便越來越多人上街，委內瑞拉的反對派依舊必須參與這種政治內部的遊戲。[Jack Nicas](#) 在《紐約時報》上寫道：

「密西根州立大學研究威權主義的政治學教授 Erica Frantz 的分析顯示，在1950年至2012年期間，473名失去權力的威權主義領導人中，近三分之二是被政府內部人士罷黜的。為了對抗這種威脅，獨裁者經常嘗試政治學家所謂的『防止政變』（coup-proofing）：他們將安全部隊分成各種分散的單位，藉此防止任何一個分支機構積累過多的權力，同時也會促使軍隊間相互監視。分析人士說，這就是委內瑞拉的寫照。」

Maduro應該知道，他能「防止政變」的程度有限。在幾乎所有獨裁者的政治生涯中，都會有這種時刻：就像1989年12月的 Nicolae Ceausescu 一樣，他們看著自己認為是支持者的人群，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掌聲，只聽到嘲笑。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他們最好有一架直升機和一名忠誠的飛行員隨時待命。■

來信寄至：John Feffer <johnfeffer@gmail.com>

本文是美國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的一個計畫——由全球對話與外交政策聚焦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合作撰寫的。

> 全球氣候正義與 巴勒斯坦解放

Hamza Hamouchèn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荷蘭



出處：Markus Spiske, 2019, 在Pexels。

在 2023年12月於杜拜舉行的COP 28氣候峰會上，哥倫比亞總統古斯塔沃·佩特羅公開表示：「對巴勒斯坦人民施加的種族滅絕和野蠻行徑，是那些因氣候危機而逃離南方者所面臨的命運……我們在加薩所看到的，是未來的預演。」

他是對的。如果我們不組織起來，並積極反抗，加薩的種族滅絕可能預示著更壞的事情即將來臨。帝國及其全球統治階級願意犧牲數百萬黑色和棕色皮膚的身軀，以及白人工人階級，以繼續累積資本，聚集財富，並維持他們的統治。

> 將成本轉嫁給自然

資本主義始終是一個無償系統。成本系統性地外部化並轉嫁到其他地方：社會再生產中女性和照護者承擔的主要是無償的成本；從城市到農村；從北方到南方，造成犧牲體系區域的形成，這一動態是通過非人化、他者化和種族主義來促進的；以及將成本外部化到自然界，將其視為可以支配和掠奪的實體，甚至被視為廢物的排放槽。這導致了生態和氣候危機。

我們所經歷的全球氣候危機的影響在階級、性別和種族上有所不同，並且在城市與農村、全球北方／帝國核心與全球南方／邊緣之間也存在差異。在殖民者和被

殖民者之間的線上，也能明顯區分這些影響。

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但其影響和脆弱性存在巨大差異，因為以色列的殖民者一殖民政策已經掠奪並控制了大部分資源，從土地和水源到能源，並且在巴勒斯坦人的背上，與帝國主義力量的積極支持下，發展了可以幫助緩解氣候危機影響的技術。

> 全球氣候正義與巴勒斯坦解放

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背景下談論氣候與生態問題，或許會讓人感到不合時宜，甚至不恰當，但我認為氣候危機與巴勒斯坦解放鬥爭之間存在重要的交集。事實上，沒有巴勒斯坦的解放，就不會有全球氣候正義：巴勒斯坦的解放也是拯救地球和人類的鬥爭。這並不是簡單的口號，正如我在以下段落中所解釋的。

首先，當今的巴勒斯坦完美地展現了當前體系的醜陋，並彙聚了其致命的矛盾。它還顯示出向大規模使用殘酷暴力的趨向。葛蘭西曾說過：「危機恰恰在於舊的正在死亡，而新的無法誕生；在這段過渡期，出現了各種病態的症狀」。

其次，今天在加薩發生的事情不僅僅是種族滅絕。我不確定我們是否擁有正確的術語來描述當前對巴勒斯

坦人施加的所有毀滅和死亡。儘管如此，現在發生的事情也是生態滅絕，或者有些人稱之為「集體滅絕」，即對整個社會和生態結構的消滅。

第三，加薩的種族滅絕戰爭與其他戰爭一起凸顯了，戰爭和軍事工業複合體在加劇生態與氣候危機中的作用。美國軍隊本身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體制性排放者，其排放量超過丹麥或葡萄牙等整個西方國家。在加薩戰爭的頭兩個月，以色列的排放量超過至少二十個國家的年排放量。其中約一半是由於美國向以色列運輸武器造成的。美國不僅是種族滅絕的活躍參與者，也是發生在巴勒斯坦的生態滅絕的重要貢獻者。

第四，這是我主要的論點（基於Adam Hanieh和Andreas Malm的研究），我們無法將對化石資本主義和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的鬥爭與解放巴勒斯坦的鬥爭分開。以色列作為中東的歐美殖民地，是一個帝國前哨站。Richard Nixon總統時代的美國國務卿Alexander Haig曾直言不諱地說：「以色列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國航空母艦，無法沉沒，甚至不載有一名美國士兵，位於美國國家安全的關鍵地區」。

> 中東與全球化石燃料體系

中東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如今，該地區不僅在調解新的全球貿易、物流、基礎設施和金融網絡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還是全球化石燃料體系的關鍵節點，並在維持化石資本主義的運行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通過其石油和天然氣供應。事實上，該地區在全球碳氫化合物市場中仍然是中心軸心，2022年全球石油生產的總額約為35%。以色列也一直在尋求成為東地中海的能源樞紐（透過新發現的天然氣田如Tamar和Leviathan）：這一願望得到了歐盟在烏克蘭戰爭背景下試圖多元化能源來源以擺脫對俄羅斯依賴的支持。在戰爭的最初幾週，當以色列授予多家化石燃料公司探索更多天然氣的許可時，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並未構成任何障礙。

目前美國在該地區霸權的兩個主要支柱是以色列和富裕的海灣石油君主國。作為首要的區域盟友，以色列在維護美國主導的帝國在該地區（及其他地區）的統治和對廣大化石燃料資源（主要是在海灣和伊拉克）的控制中發揮了基本作用。正是在這一框架下，我們需要理解美國及其盟友在政治和經濟上將以色列整合進入該地區的努力，這一努力是基於主導地位的：包括先進的技術、武器和監視設備，以及海水淡化、農業生產、能源等領域的發展。

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正常化協議可追溯到1978年以色列與埃及之間的《大衛營協議》和1994年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第二波正常化則是在2020年由Trump促成的《亞伯拉罕協議》，包括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

在10月7日襲擊之前，預期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在美國的保護下將簽署一項類似的協議，從而鞏固美國在該地區的帝國計劃。這將徹底終結巴勒斯坦的事業。因此，巴勒斯坦解放鬥爭不僅僅是一個道德和人權問題，而是根本上和本質上是反對美國主導的帝國主義和全球化石燃料資本主義的鬥爭。在深度種族主義的以色列殖民地被拆除，以及反動的阿拉伯政權（主要是海灣石油君主國）被推翻之前，將不會實現氣候正義。

巴勒斯坦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化石燃料資本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全球戰線。我們所有人，無論是氣候正義運動家、反種族主義組織還是反帝國主義的倡議者，都有責任積極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鬥爭，並捍衛他們以任何必要手段抵抗的不可否認的權利！我們面前的任務非常艱巨，但正如Fanon曾經勉勵我們的，我們必須在相對的默默無聞中，發現我們的使命，實現它，並確保不背叛它。■

來信寄至：
Hamza Hamouchène <hamza.hamouchene@gmail.com>

這是一篇稍加編輯過的演講版本，由Hamza Hamouchène在2024年7月13日於倫敦舉行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解放節上發表。

> 西班牙的社會運動：二十年來的轉變

Marta Romero-Delgado和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馬德里康普斯頓大學。
Gomer Betancor Nuez，國際遠距教學大學，西班牙。



出處：
Breno Bringel，西班牙馬德里康普斯頓大學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壁畫，2024。

過 去十年來，西班牙的社會運動研究蓬勃發展，不只提供了許多新的視角，更突顯了複雜網絡中多元聲音與不同議程的跌宕。許多研究主要關注「憤怒者運動」（或稱15M運動）和它在2011-2012年後帶來的各方影響。然而，也有另一群處在憤怒者動員核心或邊陲位置的其他社會運動，他們所經歷的重大改革經驗是相較之下容易被忽視的。

基於以上的考量，我們從跨學科的視角出發，藉此思考過去二十年的西班牙社會運動面臨了哪些對話與變革。我們合著編輯了一本探究社運起源與**重組過程的書**。本書描繪了西班牙女性主義與LGBTQ+運動如何與勞工與反種族主義運動對話，並且同時關注反戰運動和平運動帶來的嚴峻挑戰，以及極右派運動重新浮上檯面後，企圖透過使西班牙政治「歐洲化」來改變國會當前的變革走勢。

> 跨學科、對話與全球視角

社會運動研究中有一塊由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學，以及社會心理學和應用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所構成的交叉領域，各學科都帶入了不同的問題和分析視角。然而，我們的著作也強調社會運動的研究需要

從貫時性的切入視角去思考社運者的聲音。因此，在我們所編撰的這本書中，我們透過跨學科的視角與鑽研歷史與政治研究的學者對話。儘管在歐洲已經出版過使用這種研究取徑的書籍，但本次計畫所提供的對話視角開啟了統合記憶、遺產以及——最重要的——反思性變革和預測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此書的部分章節也提供了社運人士視角的分析。

儘管本書的多數作者都擁有學術背景，但他們的研究連結了生活經驗，探討理論與實作如何在性別、性、種族、勞工權益、社會衝突和和平議題等領域互動發展。我們的書更進一步關注近期西班牙社會運動中所帶有的歐洲化性質，以及國內針對這個現象的研究，其中包含了這個主題中的全球化進程。我們所挑選的案例突顯了西班牙充滿爭議的政治與我們書中以跨學科取徑分析的區域化以及全球化趨勢之間的關係。

> 西班牙的社會運動

若想了解全球結構，就必須先了解各地的情形。西班牙所經歷的佛朗明格獨裁政權（1936-1975），影響了後續由精英主導的民主改革，以及西班牙政治與政策

的改革動力。政治體系的威權遺產和這種由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決定了近幾十年西班牙社會運動發展的背景與生態，因此大多數西班牙社運的背景都鑲嵌在過去獨裁政權正式或非正式的遺產中。直到這個世紀之交或再更近期的時候，社會運動的樣態才逐漸轉向，開始出現外於政治圈的行動者。在這段演變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義務役的結束，這世紀之初女性墮胎權的抗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動員，包含了對LGTBIQ+權利的肯認，以及在2010年代開始的轉型正義。然而，近期極右翼的活動及政黨，象徵著後佛朗明哥主義支持者的出現，他們所主張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極端保守主義也正與歐洲與美國支持者的全球網絡相呼應。

因此，若想研究在歐洲化與全球化發生之前和發生的過程中，各個多元卻又相關的社會運動所採取的路線差異，就必須將西班牙過去政治和文化所帶來的影響視為分析的基礎。西班牙的民主化進程不只處理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議題，同時也處理了國內與政治經濟精英中仍存在的後多佛朗格主義壁壘，這些都是過去相關研究容易忽略的部分。

> 當前與未來研究的不連續性與路徑

西班牙社會運動研究的黃金時期吸引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並促進這個領域的發展。因為15M運動，我們有機會了解那些促使公民參與的社會運動以及外於政治機構的民主改革聲浪之間的關係。不只如此，它也標示著學術界的一個轉折點。這個現象讓西班牙成了國際間社會運動研究的核心，不只因為國內對社運有著很好的迴響，也因為西班牙的社運吸引了許多國際間的學者將西班牙的例子當作研究對象。

由各種研究計畫所構成的研究領域，讓西班牙的研究者不只更加國際化，也更進一步與歐洲網絡接軌。西班牙社運研究國際化和歐洲化的現象反而促進了與全球南方其他研究領域的地區性與國際性對話，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地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在這個領域提供了一個針對國際情形的地區性取徑和社會運動挑戰的匯聚點。結合了學術和社運人士針對自身所參加的社運的研究，這種多元視角促使了一本將理論與反思性實作相結合的書誕生。

儘管我們的提案並不像其他研究社會運動的取徑那般創新，但我們仍希望可以基於我們書寫的立場及對象，給予這個領域一個誠實且嚴謹的貢獻。本書最主要的成果是，開啟與西班牙社會運動的貫時性與對話性研究以及提供一本可以擴展既有社運知識的手冊，內容包含了各類社會運動、聯盟組織，以及各地對全球趨勢的訴求。不只如此，我們，以及其他合著作者，都致力於讓本書可以在[開放取用平台](#)上供大眾閱讀。

以西班牙語來撰寫本書確實會為傳播我們的研究成果帶來挑戰，這對於所有以英語作為主要工作語言，並且同樣用英語來思考和政治、社會問題、衝突與行動者的環境中所產出的出版物而言尤其如此。這樣的挑戰對於處在全球或區域邊陲國家中的學者和社運人士尤其嚴重。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本書可以被翻譯成其他語言，讓非西班牙語的讀者能夠更容易的了解本書內容；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全球對話》中與其他實體和語言的互動，可以使本書想談論的對話變得可能。■

來信寄至：

Marta Romero-Delgado <martaromerodelgado@uc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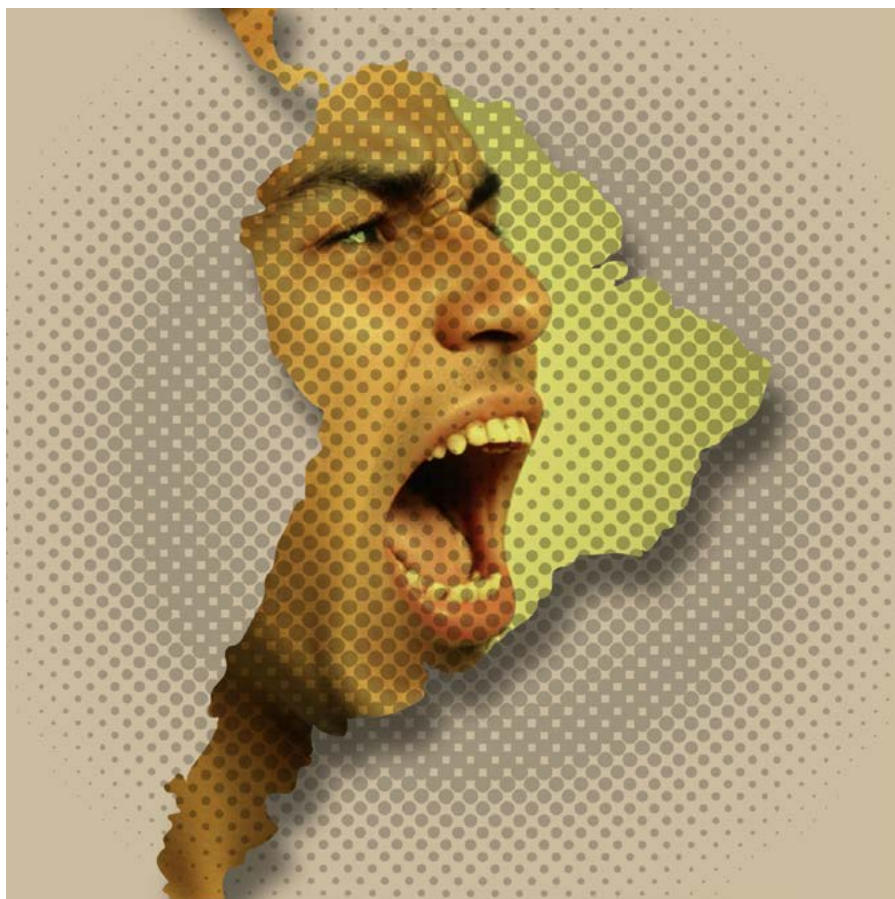
Andy Eric Castillo Patton <aecastillopatton@ucm.es>

Gomer Betancor Nuez <gbetancor@poli.uned.es>

> 重建依附理論

André Magnelli，Ateliê de Humanidades、Felipe Maia，茹伊斯德福拉聯邦大學。
Paulo Henrique Martins，伯南布哥聯邦大學，巴西。

插圖：Arbu，2024。



在當前的背景下，承認依附理論的相關性和重要性意味著持續進行關於知識分子的社會學、思想的歷史與流通，以及對邊緣和半邊緣地區現代化理論的修訂的研究。此外，這必須形成對現代性和全球社會過程的通盤理解。但重要的是不要將這些理論的出現條件一概而論，將其視為來自歐洲和北美中心之外的智識產出，就好像它們是全球南方所有社會共同的產物。這樣的一般化只會削弱來自半邊緣體系的知識分子的貢獻，他們試圖從經歷了重要工業化過程和形成了政治組織的中產和工人階級的國家社會內部理論化現代化。正是作為拉丁美洲歷史中的一種本地化經驗，依附理論才能成為擴展對不同地區現代化批判的參考。

> 具有拉丁美洲根源的視角

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成為質疑現代化理論並創造可產生獨立工業化模式替代方案的創新理論特定孕育地。這一過程始於由CEPAL經濟學家提出的結構主義—工業主義論題，並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由拉丁美洲社會學家進一步發展，他們將CEPAL辯論延伸到政治領域。當時，知識批評正在擴展，受到對帝國主義和依附反應的驅動，沿著不同的反思路徑進行。它涉及與原住民、非裔後代和女性的動員之間的對話，這些動員是在批判殖民性和支持解放的背景下進行的。

依附理論是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之間形成的，代表了拉丁美洲對理解二十世紀社會變

>>

遷過程最具原創性的知識貢獻之一。它們關注的核心是資本主義擴張的「不均衡與綜合」性質以及現代性的社會和政治形式，以拉丁美洲歷史作為經驗參考。透過取代當時在社會科學和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化理論的觀點，並反對蘇聯馬克思主義所宣揚的論點，依附理論使我們能夠理解國家發展主義策略和保守主義一專制現代化計劃所呈現的霸權性替代方案的後果和局限性。此外，它們突顯了地方政治行為者與全球資本流通系統之間的多重聯繫。

採用歷史性且經常具有比較性的視角，有助於檢視拉丁美洲菁英的「文明」或「克服落後」計劃與歐美模型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自十九世紀以來在國家和國家建設過程中重複其異質地位。除了研究國際系統中的不平等和依附關係外，還獲得了關於殖民性作為這些社會形成的結構性特徵的新見解，包括「內部殖民」的因素。拉丁美洲社會既可以從自身條件理解，也可以與其他邊緣形成進行比較，而不應被視為不完整的現代化形式。

> 知識重建

在我們最近編輯的書籍《[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知識重建](#)》中，我們提供了對拉丁美洲依附理論的概述。該書涵蓋了它們的智識出現要素、在不同背景中的接受條件、對社會學理論的貢獻，以及通過當代主題（如政治批評、環境和氣候危機或後殖民問題）更新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旨在將這一重要貢獻納入當代社會理論的歷史和範疇，幫助理解全球社會理論發展的多樣性及拉丁美洲視角的原創性。該時期的某些產出不可避免地帶有當時的印記——屬於特定情境的智識、政治和社會問題。然而，依附和不平等的關係有其歷史和持久性，並在世界體系或全球資本主義的層面上被提出和重新提出，因此這一知識重建也涉及當前的問題。

> 從國家獨立過程到CEPAL

拉丁美洲在全球現代化另類思維組織中的中心地位並非僅僅是偶然的。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在十九世紀經歷了國家獨立的過程，而亞洲和非洲國家則直到二十世紀才經歷類似的過程。拉丁美洲國家的早期政治解放對於一場重要的美學和智識運動的出現產生了影響，這場運動始於法律和工程學院的建立，也包括文學和藝術運動，並在二十世紀隨著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而更加深入。

在二十世紀的頭幾十年，對於大陸上國家社會形成的反思已有一定歷史，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批拉丁美洲經濟學家的顯著動員開始在歐洲和美國之間活動。他們對於國際自由貿易能幫助製造國與原材料生產國之間實現平等貿易的自由主義論點持懷疑態度。在馬歇爾計劃的偉大願景影響下，該計劃旨在重建戰後的歐洲，他們理解到思考國家規劃以促進拉丁美洲現代化的重要性。

這段歷史中的一個里程碑是1948年在智利聖地亞哥成立的CEPAL（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這個機構聚集了一群來自不同背景的社會科學家，尤其是在經濟學和社會學領域，他們在這個知識循環中成為了最重要的參考點，儘管面對美國安全機構的抵制，這一循環仍在擴展。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CEPAL在塑造以國家為主要現代化推動者的發展主義模型中發揮了戰略作用。其主要制定者包括智利經濟學家Raúl Prebisch和巴西經濟學家Celso Furtado。

> 思想的流通

我們這本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展示知識分子和思想的流通在二十世紀下半所創造出創新理論視角方面的潛力，這一點在拉丁美洲尤為明顯。目前，社會科學日益全球化，人們越來越意識到現代社會並不存在單一的歷史軌跡。因此，考察依附理論在邊緣或半邊緣地區形成和展開的豐富多樣的辯論和理論化的領域，有助於理解當代歷史中那些通常不易被察覺的方面。在南美形成一個具有公認創造力和自主性的思想、機構和知識分子的循環挑戰了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常規形象。這些形象往往描繪出一種簡單的分工，認為全球南方收集社會變革的大過程數據，而北方則對其進行理論化，產出成為社會自我認識的概念和理論的庫存。

正是在與霸權理論的對抗中，這個拉丁美洲知識分子團體在二十世紀中期創造了自主反思的條件。一方面，這使其成為擁有自身豐富和深刻反思的拉丁美洲知識史的一部分。當地菁英努力在該地區建立大學，並反思其去殖民化過程的具體特徵，以及他們試圖組織國家社會的努力，其代表人物包括 José Martí、José Carlos Mariátegui、Juan Bautista Alberdi、Domingos Sarmiento 和 Joaquim Nabuco 等，都是這段歷史的長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中期該地區出現的特定思想循環具有其自身的特殊特徵。

拉丁美洲知識分子在同一辯論領域中來自不同國家、學科專業和政治立場的融合，對於創造一個原創的關聯性生產網絡至關重要，這一網絡橫跨該地區的多個國家。這或許是拉丁美洲首次作為一個相關且原創的全球知識中心，具備將其影響力投射到其他知識脈絡中的能力。我們書中的幾個章節中突顯了這些問題，旨在闡明在拉丁美洲思想史中知識分子的流通是如何發生的。

重建這些路徑有助於我們理解依附理論的產生是如何真正具備社會和集體的維度，並體現出全球南方思想流通的精緻與複雜性。與此同時，參與的知識分子持續與知識生產的霸權中心保持交流的管道，形成的循環網絡比僅僅是地區性更為寬闊。而許多因素促成了這一點，包括作為五個聯合國經濟委員會之一的CEPAL的成立，將其納入國際機構體系中，還有來自歐洲和北美的知識分子在該地區的存在、拉丁美洲社會科學家前往外國大學的學習與研究之旅，以及他們的作品在其他脈絡中的出版與接納，這些額外的主題也在我們書中的幾個章節中也進行了脈絡的重新爬梳。■

來信寄至：

André Magnelli <prof.andremagnelli@gmail.com>

Felipe Maia <felipe.maia@ufjf.br>

Paulo Henrique Martins <paulohenriquemar@gmail.com>

